2935

歷史教學

21

1952

一九五二年　九月號

·歷史教學月刊社出版·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目錄

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翦伯贊（一）
天津大中學歷史教師座談會記要……本社（五）
文譯 美英資本家是太平天国起義的絞殺者……巴拉羅夫斯基原著 黎子耀譯（七）
一千年來伊斯蘭教（回教）在新疆的發展……蘇北海（一一）
國賊蔣介石做交易所經紀人的罪證……陸丹林（一六）
人物討論 史可法是否民族英雄？……羅元貞（一八）
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幾個具體問題……石雄奎（二〇）
中國歷史史前時期文化述要……李光璧 傅彬甫（二二）
講課紀錄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來新夏（三二）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二年

九月號

總第二十一期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歷史教學月刊編委會

出版者 歷史教學月刊社

天津哈爾濱道錦榮大樓五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天津分店

天津羅斯福路

各地新華書店均可訂閱

印刷者 知識印刷廠

歷史教學訂閱辦法

1 本刊訂爲月刊，每月一日出版，實價二千八百元。

2 本刊三月三期實價八千四百元，半年六期實價一萬六千八百元，全年十二期實價三萬三千六百元。

3 本刊發售價格變動或特大號加價時原訂戶不受價格漲落影響。

4 訂閱本刊平寄郵費免收，掛號每期另加掛號費。

5 郵寄刊物的中途遺失，若爲掛號寄遞，本店負代查之責。

6 訂戶由本店經常供給圖書目錄。

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

翦伯贊

一

一兩年來，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評論歷史人物的文章。許多歷史人物，如屈原、荊軻、秦始皇、岳飛、史可法等都被提出來重新加以評論，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但是在人物評論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

二

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傾向，即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對歷史人物提出過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歷史人物。好像不如此就會失掉立場，就不能通過具體的歷史人物去進行階級鬥爭的歷史教育。

當作一個人民的歷史教師或歷史研究者評論一個歷史人物，是應該公開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去和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歷史人物的歪曲作堅決的鬥爭；但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不就等於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無產階級的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而是要我們用無產階級的歷史觀點，即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評論歷史人物。

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出發，評論一個歷史人物，就不是用我們今天的標準去要求一個歷史人物；而是要嚴格地聯系到這個歷史人物當時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因爲一定的歷史時代，只能產生一定的歷史人物，這是歷史的局限性，如果把這種歷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顧或估計得不够，都不能正確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的決議中說：「包克洛夫斯基『學派』的基本錯誤，是它歪曲地解釋歷史事實，與歷史唯物論相反，以今天的眼光來說明歷史事實，而不以歷史發生時的條件來說明歷史事實，因此歪曲了眞正的歷史。」【註一】這幾句話適用於歷史事實的評論，也適用於歷史人物的評論。

但是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竟有人替秦始皇扣上「極端的唯武器論者」（沈彭：「秦始皇」）【註二】的帽子，又有人批評秦始皇，說他「登上寶座以後，勝利沖昏頭腦，便開始脫離羣衆。」（胡思庸：問題討論）【註三】又有人宣佈關羽的罪狀，說他有「個人英雄主義」，以及「破壞統一戰線」等情形（丘沙：從「關羽之死」想到舊劇改革）【註四】。又有人批評岳飛，說岳飛雖然曾經抵抗金人的侵略，但因他後來服從宋高宗趙構的命令，從前線撤退，就是「封建奴才思想」，就只能成爲一個「封建時代的平庸脚色」，就不算是「民族英雄」（秦文兮：岳飛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註五】。又有人責備史可法，說他曾經鎭壓過農民革命，又沒有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因而以爲他雖然「寧死不降」，也只是爲了殉階級，並不是爲了殉民族。」（丁正華：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嗎）【註六】像這樣的說法都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不對的。

我們可不可以替秦始皇扣上一頂「極端唯武器論者」的帽子，並責備他說他脫離羣衆呢？不可以。因爲封建主義乃至資本主義時代的統治者，他們只能認識武器的力量，不能認識羣衆的力量。一直到現在美帝還以爲細菌彈可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們怎能要求兩千年前的秦始皇不唯武器呢？至於秦始皇之脫離羣衆，並不是勝利衝昏了頭腦，在他的頭腦未被勝利衝昏以前，也沒有接近過羣衆，因爲一個封建皇帝是不可能接近羣衆的。

我們可不可以替關羽扣上「個人英雄主義」的帽子並加他一個「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呢？不可以。因爲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在今天才被批判，而封建時代正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至於「統一戰線」之出現於中國的歷史，是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關於這一點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說得很明白，他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註七】由此可知，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而且統一戰線係指無產階級爲了進行革命鬥爭而團結並領導其他階級的一種政策，並不能應用於兩個封建統治集團的聯盟上。因而即使吳蜀的聯盟是由於關羽的驕傲而破壞，也不能說他就是破壞了「統一戰線」。

岳飛和史可法他們都有缺點，都不是完人，例如他們都忠於地主階級，

忠於封建皇帝，並且都曾經和農民爲敵，但我們可不可以因此就說他們不能稱爲民族英雄呢？不可以。因爲他們都曾經忠心地英勇地保衛過祖國，都企圖使祖國從外來侵略的進攻中得到拯救，並且都爲了這樣的目的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業績就已經客觀地超過了他們偏狹的階級利益，而被提高到民族利益上了。假如我們不要求一個封建時代的人物，沒有忠君思想；不要求一個封建時代的愛國主義者，就具有和我們今天一樣的愛國主義精神，我以爲岳飛和史可法是應該稱爲民族英雄的。

三

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又可以看到一種與上述的情形相反的傾向，有人基於一種最好的動機，爲了培養對過去的愛，認爲我們應該從歷史上找出多多益善的傑出人物，因而對於某些當時是積極的人物的歷史局限性估計不够而予以過分的或不適當的表揚。甚至用現代的辭彙來描寫歷史人物，企圖使之現代化理想化。好像不如此就不能通過具體的歷史人物進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

爲了進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我們是應該表揚一些值得表揚的歷史人物，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有權把歷史人物現代化或理想化，而是給予他們以恰如其分的評價。應該知道把歷史人物現代化或理想化起來，不但不能幫助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而是相反地妨害了它，因爲這會淆混人們對於祖國在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時期之間的本質上的差異的認識，還會造成一種抹煞歷史遠景的危險，這會引導人們不向前看而向後看。

正確的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對於歷史人物的處理，應該不僅是培養人們對傑出的歷史人物的愛，讓人們因爲我們有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而感到驕傲，而且應該讓人們進一步認識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不論如何傑出，但比之我們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此外我們也應該爲了培養人們對有害於我國進步與發展的歷史人物的恨，而把那些過去歷史上的壞蛋予以譴責。

但是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有人把西漢時代的鐵官徒暴動，說成是「無產階級造反」，即因認定鐵官徒是「無產階級造反」，所以他說鐵官徒「較之後世出身不光明領導欠正確的黃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萬倍。」（張政烺：漢代的鐵官徒）【註八】又有人把李自成理想化，說他在政治上已經「能够團結各階層」，在軍事上已經「改變流寇作風」。（謝國楨：關于李自成）【註九】甚至有人把李自成和我們今天的革命領袖人物相提並論。王季敏先生在座談會上說：「假使你問學生：『中國有甚麼偉大的軍事家？』他便答：『李自成，朱總司令。』『還有沒有』？『不知道』。」【註十】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農民革命的領袖人物，是值得表揚的，但我們能不能說西漢時的鐵官徒暴動就是「無產階級造反」呢？不能。因爲無產階級之出現於歷史舞台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的。無論如何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代，中國是不可能有無產階級造反的。同樣的理由，我們也不能說西漢時代的鐵官徒，比之後來的黃巢宋江等「要高超多少萬倍。」如果這樣說，中國的反封建地主的起義，豈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這與現實的歷史是不符合的。

我們能不能說李自成在政治上已經「能够團結各階層」呢？不能。因爲他和李巖等個別知識分子的結合並不等於農民與知識分子階層的團結。我們能不能說李自成在軍事上已經改變了「流寇作風」呢？不能。因爲流寇作風是古代農民戰爭的特點，也是他們失敗的原因，李自成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說：「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戰略問題）【註一一】又說：「應當認識到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爲今日環境所不許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註一二】由此可知流寇作風只有到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才能廢除。至於把李自成和今天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相提並論，更是捨棄了對歷史人物作階級性的評價，這種說法，只有模糊學生對歷史人物的本質的認識。

同樣的不適當的表揚也表現在對文學家的評論中。例如有人說屈原的作品就『預見性地反映了他那個特定的時代的要求。」（文懷沙：人民詩人屈原）【註一三】又有人說白居易「完全站在他那時代人民的一邊——從而永遠站在一切時代的前列。」（李又然：白居易的賣炭翁）【註一四】又有人說顧炎武的「科學的文學發展觀點和帶有創造性的反對摹擬的寫作方法……遠在五四時代胡適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三百年以前就已經提出了的。」（馬漢麟：愛國詩人顧炎武）【註一五】這些說法也是錯誤的。

在我們的歷史中，產生了許多天才的文學家，其中有些人具有強烈的正義感，他們敢於大胆地暴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熱烈地同情那些被壓迫的人們，特別是屈原，他不但敢於暴露，而且敢於幻想，像這樣的文學家是值得我們表揚的。但是我們能不能說屈原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預見性呢」？不能。因爲只有當馬克思發現了歷史的規律性以後，人們才能依照這種規律性去客觀地對歷史發展的前途有所預見。

白居易的作品，誠然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良好範例，但能不能說他就是「完全站在他那時代人民的一邊」而且是「永遠站在一切時代的前列」呢？

不能。因爲只有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才能是完全站在人民的一邊，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學家，他們可能同情人民，但決不能完全站在人民一邊。而且在歷史上也決沒有一種人永遠站在一切時代的前列，因爲站在封建時代前列的人物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而站在我們今天最前列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

至於顧炎武，無論在學術上或人格上都是值得表揚的，但我們能不能把他的文學改革論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相提並論呢？不能。因爲顧炎武的文學改革是屬於封建主義範疇的，而胡適的文學改革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且一個人不可能在三百年以前就產生三百年以後的思想正如魯迅所云：「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予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在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因爲人的思想和認識是受客觀存在所制約的，「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四八頁）

四

從歷史人物的評論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傾向，卽人們爲了結合現實政治，常常把過去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和現在的人物或事件作一種輕率的歷史類比，甚至不科學地把他們等同起來，好像不如此，就是脫離現實，就失掉了歷史科學的現實意義。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喩今的方法去影射當時的反動派，其實這樣以古喩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糢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特別是今天的現實與過去歷史上的現實，已經起了本質上的變革，把過去歷史上的現實和今天的現實等同起來，那不是把歷史上的現實現代化使之符合於今天的現實，就是把今天的現實古典化去牽就歷史上的現實，兩者都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錯誤的。

例如有人把戰國時的信陵君救趙和明朝李如松征東，都寫成了和我們今天的抗美援朝一樣。董傑：「記京劇信陵君的演出」說：「信陵君」劇本「用歷史事實，結合了當前抗美援朝的偉大任務，主題思想都很明確，並告訴我們，唇亡齒寒，抗秦卽援趙，保家先衛國的許多道理。」【註一六】方詩銘：「十六世紀李如松在朝鮮進行的抗日援朝戰爭」一文中，用了很多現代流行的言語如「抗日援朝，保家衛國。」「中朝部隊的戰鬥，是完全正義的」「是完全符合當時中朝兩國廣大人民的要求的」【註一七】等等，去努力把明朝說得和我們現在的抗美援朝一樣，這都是不對的。因爲今天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是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高度發揚了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能和它比擬。

又有人把荊軻刺秦王描寫爲與今日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相同的事業。武克仁改編的「易水曲」中說，荊軻之刺秦王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託」，又說「千萬被害之人民，都是我荊軻的同黨。」【註一八】當「易水曲」在重慶上演時，報紙上刊登的廣告大書「侵略必然歸於失敗，和平要用代價換來，」「荊軻刺秦血濺咸陽，羣衆抗暴氣吞易水，」【註一九】像這樣的說法眞是牽強附會。據史籍所載荊軻刺秦王，並不是全燕父老的委託，而是受燕太子丹的命令，他的同黨只有秦舞陽等少數人，而不是「千萬被害之人民」。因而他之血濺秦庭與羣衆毫不相干，而是爲了報答燕國的太子。而且侵略者並沒有因荊軻之死而失敗，荊軻的生命也並沒有換來和平，假如用這個故事來影射今天保衛和平的運動，豈不給羣衆以相反的印象。特別應該指出，這樣的比法是有害的，因爲這樣會給羣衆一種錯覺，以爲保衛世界和平可以採取暗殺個人的手段，而不依靠羣衆的力量。

此外，又有人把王安石的「青苗法」說成「類似今日的農業貸款，」「保甲法」是「加强了人民的武裝」（馬昌夏：王安石）【註二〇】這樣的說法也是不對的，因爲封建統治者決不會加强人民的武裝；而『青苗法』與今日之農業貸款更是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爲了緩和農民的反抗，後者則是爲了發展農業生產，以便從速走入社會主義社會。

也是爲了結合現實，在歷史人物評論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號召我們學習古人。例如有人說：『站在今天現實需要的高度來談杜詩時，首先我們應該學習這個「詩聖」的政治態度，生活態度，創作態度。』（顏默：談杜詩）【註二一】又有人說白居易的詩「是爲人民服務的大衆化的詩歌……値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棠克耕：白居易的「秦中吟」）【註二二】又說：「他的詩不但打擊了人民的敵人，也培養了人民戰鬥的意志，我們站在今天新愛國主義旗幟下，要向這位祖國的人民詩人學習他的戰鬥精神。」

我們可不可以向杜甫白居易學習呢？可以向他們學習，因爲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但是必須指出，我們今天的時代已經不是杜甫和白居易的時代，因而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文藝作家的政治態度生活態度創作態度，就不是杜甫那樣的態度；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戰鬥精神，也不是白居易那樣的戰鬥精神。今天的文藝作家所要學習的，應該是工農兵，因爲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戰鬥精神，才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典範，才是爲勞動人民的事業，爲社會主義的前途，爲世界的和平而不倦的鬥爭的典範。學習他們才可以作爲鼓舞爲祖國而忘我的勞動戰鬥的源泉，只有在他們的

身上，才可以看到勞動人民的英雄主義。

五

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我們始終沒有看到有人提出歷史上與各族之間的戰爭有關的人物，從這裏，我們知道很多人在這個問題面前遇到了困難。爲了避免大漢族主義，有一個時期，人們幾乎要把從事對外戰爭的歷史人物都要說成侵略，好像不如此就會違反民族政策。後來，又想用一條簡單的公式來處理這個問題，卽依據戰爭的性質來決定對於這一類人物的態度。如果是從事侵略戰爭的人物，就應該否定；反之，如果是從事保衛戰爭的人物，就應該加以肯定。至於何謂侵略何謂保衛則決定於疆界問題，卽如果打出自己的疆界就是侵略；反之，如果在自己的疆界之內與另一民族作戰就是保衛。

我們應該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侵略，因爲各民族權利平等，而彼此無所從屬，這是我們民族政策的原則。但是必須指出，這種民族平等的政策，只有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才能出現；如果把我們今天的民族政策去要求歷史上的古人，那就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也就是錯誤的。

在長期的封建主義時代中，漢族和其他各族之間，有時和平共居，有時相互之間也發生戰爭。而這種戰爭，有時是侵略他族來擴大自己的領土，有時是抵抗他族的侵略保護自己的領土。在討論民族之間的關係時，應該承認這種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實是存在的，並且應該指出歷史上各族的反動統治階級所實行的侵略政策和不正義的戰爭是不對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指出侵略的客觀成果，無論如何和反動統治階級替自己定下的主觀目的，是不能完全符合，甚至是毫不相干的。尤其要指出，民族之間的問題，不能從世界史中孤立起來考察，必須放在世界史的總體中來考察，卽看這個戰爭對於當時世界史的發展，是起了推進作用還是起了阻礙作用。

讓我們拿漢朝向西域的擴張爲例吧，很自然地，而且也應該這樣說，漢武帝之出兵西域，當然不會是爲了解放西域各族人民，雖然最初是爲了抵抗匈奴的侵略，但後來則發展成爲對西域各族人民實行掠奪的政策。不承認這一點，而替漢武帝辯護是不對的。可是，同時我們要着重地指出，西域各族人民會因成爲西漢帝國之一部，免除了被較爲落後的匈奴人的奴役，而這種奴役的後果，將使西域各族人民陷於更悲慘的境遇。同時也應該指出西域各族人民因此而倂進了較爲高級的經濟機構，取得了與文化水準較高的漢族人民相接觸的可能性，這在客觀上是促進了西域各民族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着重的指出，由於西域倂入西漢帝國，因而又使漢族從西域各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東西——物質的和精神的，因而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同時由於東西文化的溝通又推動了世界史的發展。

自然，這不是說所有的民族之間的戰爭都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相反的，有些戰爭是起了破壞的作用，甚至使另一民族的社會經濟遭受到毀滅，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對殖民地的侵略就是如此。因此，我們處理民族間的戰爭，從而與戰爭有關的歷史人物時，就不能用一條簡單的原則，來貫串一切歷史時代，而是要根據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具體歷史條件來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的解決歷史上與民族戰爭有關的歷史人物問題。

編者按：歷史人物的評論，是一般歷史教學工作者，最感困難的問題。現在翦先生發表「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一文，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尤其是當本刊正在以「史可法是否民族英雄」爲題，蒐集各方面意見，展開討論之際，這篇文章對我們今後討論更有很大的幫助。

【註】

（一）見思想方法論附錄

（二）見進步日報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史學週刊四十二期

（三）見新史學通訊一卷七期

（四）見文藝報二卷二期

（五）見歷史教學一卷五期

（六）見歷史教學十七期

（七）見毛澤東選集卷二頁五七三

（八）見歷史教學創刊號

（九）見歷史教學一卷五期

（一〇）見新史學通訊一卷四期愛國主義與歷史教學座談會紀要

（一一）見毛澤東選集卷二頁三八〇

（一二）見毛澤東選集卷一頁九九

（一三）見光明日報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四）見文藝報三卷七期

（一五）見光明日報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六）見戲曲報四卷四期

（一七）見歷史教學二卷六期

（一八）轉引自游藝：反歷史反人民的易水曲。見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見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五一年七月

（二〇）見光明日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一）見文藝報三卷七期

（二二）見文藝報三卷十期

天津大中學歷史教師座談會記要

本社

天津教育工會及中國史學會天津分會爲了推動大學歷史學課程改革及改進目前中等學校的歷史教學，加强大中學歷史教師的聯系，在八月二十二日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參加的有天津市大中學歷史教師三十四人。教育工會和史學會天津分會在會前曾廣泛的徵求了一些有關的意見，擬訂了一個討論提綱，寄發給與會者，使能作較充分的發言準備。提綱的內容是：

一、目前中學歷史教學上存在的問題

1、師資問題

2、觀點與方法問題

4、教材與參考書問題

4、學習蘇聯經驗問題

二、反動統治時代高等學學校歷史教育的批判

1、課程組織

2、內容觀點（包括史學界風氣）

3、教學方法

三、對於高等學校歷史系改革的希望

1、方向與重點

2、課程設置（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

3、教學制度與方法

4、如何學習蘇聯經驗？

四、大中學歷史教育的聯系問題

1、大中學歷史教師如何配合工作？

2、大中學歷史課程如何密切聯系？

3、天津市教育工會與中國史學會天津分會在這方面應作些什麼工作？

座談會即圍繞這樣四個問題，進行討論。本社根據會場記錄，初步的整理出下面的一些要點。

× × × ×

高等教育在解放前是長期地作爲帝國主義者進行文化侵略及國內反動派進行統治的工具。因此其課程必然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需要，正如市二中教師唐世珍說：「過去大學因人設課，而所開課程也多脫離實際。」解放以來，課程雖有些變動，也增添了一些富有革命內容的課程如「馬列主義名著選讀」等，但仍然沒有進行徹底的改革，有的大學教師還開設着內容冷僻而陳舊的課程，抱殘守缺，沾沾於自己的「成就」。根據現實的需要，進行高等學校課程改革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了。

在座談會中，河北師院教師王樹民提到了師院課程問題及現在進行課改的情況，南開大學教師謝剛主和楊志玖都指明當前大中學歷史教學的脫節現象，如大學入學試題不能恰好符合中學學生旣有的程度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而楊志玖教師並在發言中說出自己所感覺到的困難，他說：「由於沒有了解高中學生的歷史基礎，所以在講課時不知道應當教學生一些什麼東西」。河北師院的孔玉芳教師更提出大學課程改革時，應增設中國史學文選，教育學，歷史教學法等課程，以更好地完成歷史教學的任務。

根據了大學教師對大學課程現況的介紹，許多中學教師如耀華中學馬奔，浙江中學張文祥，女二中唐世珍等多位中學教師也都回憶起以往身受舊教育的危害，結合了自己現在教學的體驗，熱誠地建議大學歷史系必須開設一些爲人民歷史教學所需要的課程如歷史唯物論，中國史學文選、歷史教學法等，並認爲中國民俗史及亞洲史也是重要的課程，因爲前者提供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情況，而後者特別能使學生了解亞洲最大多數被壓迫民族的歷史以及祖國今天在亞洲所担負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中學歷史教師在教學中對於歷史人物批判普遍感到困難。如津沽附中教師余和駿說：「中學教師迫切需要人物批判。」另一位教師也說到自己講課時說史可法是民族英雄，但學生看了書報後有說不是的，結果使自己就不敢確定了。因此希望大學在通史課中對人物批判加重份量。

× × × ×

關於教材方面教師們提出不少的意見，如女三中教師史亞洲認爲課本量太多。不宜于學生用，同學複習時無法找重點，無法消化，教師講課，也感吃力。還有不少教師感到初二近代史較好，資料也容易找到，高二胡華本作爲參考書較比作爲課本好些。至於世界史，有的教師認爲初三本比高三本好，後者內容平舖直敘，分期甚亂。總的意見是中學歷史課本內容廣泛，重點

不明確，希望加以改編。同時，參考材料也感到缺乏，教世界史的還採用了海斯•穆恩的「世界通史」。但這却是一本爲帝國主義侵略作辯護，鼓吹人種優越論、强調個人作用的反動書籍。南開大學教師辜燮高便深感世界史教學中參考書的缺乏。而市一中教師郭雲峯特別提到：世界史中又以亞洲部分參考書爲最缺乏。至於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部分也不易找到參考材料，有的教中國近代史，主要只依靠范著中國近代史及胡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因此感到內容貧乏運用不便。

× × ×

教育改革的道路就是學習蘇聯。在教學上根據蘇聯經驗，主要點在於進行教學時須有教學計劃，教師集體研究備課，明確教課的目的及要求等。有不少教師對於學習蘇聯經驗都談到自己的認識與體會，如津沽附中教師佘和驥說「學習蘇聯先進方法重要在于備課。」市師教師劉錫璋說「重要問題在于執行。」這都說明我們的教師們都已在開始注意學習先進的教學經驗與方法。現在天津已有市立師範等校部分地吸取了蘇聯先進經驗「五步教學法」，女三中已在開始採用組織教學。女二中還建立了學生集體溫課制度，班上有學課小組及課代表。河北師院教師王樹民和南開大學教師王玉哲也都提到教研組對教學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另外由於教材還不十分合用，參考書及教具缺乏，學生人數太多（某校一位教師任五班課，有學生二百餘人）不易了解情況等原因，在現在全面地徹底地接受蘇聯先進經驗是有一些困難的，但並不至像有的教師認爲「實行五步教學法，困難太多」的情形，因爲這些困難是可以逐步克服的。而能否依靠蘇聯先進經驗搞好教學的主要因素，還是在於教師們的主觀努力。

× × ×

在座談會中，有的教師說：「學生最感到學歷史困難，課本史料太多，內容龐雜」。這個問題，要加以分析，可能是下面三個原因：一、講課時羅列事實，偏重於史事的講解，缺乏分析批判，使學生存有枯燥無味之感。二、理論不結合實際，名詞講了不少，講一大片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史料脫節，使學生不能消化。三、缺乏階級感情。最後一點，很多的教師認爲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爲歷史是一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戰鬥性的科學，它必須貫注着愛恨的感情，是與非的觀念。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對史事的感情，來愛祖國，向前邁進。要具備有這樣的感情，歸根到底仍是立場問題。有的教師認爲自己立場觀點已無問題，只是感情不够，這是片面地看法。因爲立場和感情不能分割的，這正如一個非工人階級思想的人，要他具有對工人階級事業的高度熱愛，那顯然是會有距離的。

× × ×

這一次參加座談會的中學歷史教師表示了迫切要求學習的渴望，如：市師教師杜迪之希望史學分會擬發講授提綱；耀華中學教師馬奔希望大學教師能搜集少數民族的史料；南開女中的教師譚育鳳希望能解决新民主生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的問題；人民中學的教師杜錫錕要求組織專題報告會，交流經驗，並在「歷史教學」月刊上發表介紹人物批判的討論；市一中教師郭雲峰希望教學中的問題能得到解答；浙江中學教師張文辞要求能到高等學校去旁聽。這些希望與要求，當時都得到教育工會和史學分會負責的解答。

× × ×

通過這一次的座談，對於大中學的歷史教學工作是有不少的收穫的：首先對高等學校的課程改革來說：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會上許多教師都批判了舊的唯心的歷史觀，指出以往所開設的課程的危害性，因而也有所依據的知道應該如何來進行這次課程改革。需要添設那些課程，需要充實那些內容。更重要的是明確了高等學校歷史系爲誰服務的問題。根據教育部的精神，培養師資已是綜合性大學科系的方向和任務之一，因此高等學校與中等學校在歷史教學問題上必然是需保持着緊密的聯繫。而這次座談正是這種聯繫工作的一個可貴的開始。

其次，對於中等學校的歷史教學來說，是反映了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例如師資缺乏的問題：固然是應當大量的培養師資來補充，但是同等重要的是改造問題，現在任教的教師，不論是否以前學過歷史，但不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或多或少沾染了些舊意認識舊作風，在思想改造以後，固然克服了不少，但仍表示要以最大的力量進行自我改造。又如課本教材問題，雖然還不盡適於教學，但在討論中，也逐步認識到這是進步中的困難，而要臻於完善，須有待於大家的努力。又如學習蘇聯經驗這一點，部分教師還沒有足够的信心，固然在進行時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但總的方向是正確的，要想能更好的完成我們的歷史教學工作，是需要發揮積極性與創造性，用革命的辦法來進行的。

第三，在這次座談會中開始了大中學歷史教師的聯系，以往大中學教師彼此隔離甚久，現在會上大學教師表示應當根據中學實際需要來進行課程改革，中學教師也感到有許多問題希望得大學方面的幫助，如參考書的借用，到大學去旁聽，史料的搜集，問題的解答等。

座談會中，中國教育工會和中國史學會天津分會都負責地解答了許多教師提出的問題。座談會主席吳廷璆在總結中指出：「史學工作者任務，是光榮而艱鉅的，要認清自己的責任，積極改造思想，搞好教學」。這次座談時間雖然長達五小時，但是由於彼此間在搞好歷史教學工作這一共同目標下，都積極地提供了許多極其豐富的意見和具體的建議，而彼此間更進一步的團結一致。我們相信天津市的歷史教學工作者將在天津教育工會和中國史學會天津分會的領導下日益緊密合作地向前邁進！

美英資本家是太平天国起義的絞殺者

巴拉羅夫斯基原著　黎子耀譯

一八五〇年中國爆發了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起義。偉大的農民軍佔領了中國的大部分地方，繼續至十五年之久。它鼓舞了印度和東方其他國家的人民大衆，使本國封建皇朝和歐洲資本主義政府爲之戰慄。

國際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熱烈歡迎中國的農民運動。他們認爲中國處於社會革命的前夕，這對於文化應具有特別重大的效果。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底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裏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此用解放社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中「列强與太平革命」一章的譯文——譯者）

中國農民企圖實現自由、平等、博愛，起義者對封建壓迫，對滿清專制政體可恨的束縛起而鬥爭，在起義期間佔領了廣大領土，國中最富庶的省份，中國最主要的水道——長江，建立自己的農民國家，定名太平天国。一八五三年太平軍佔領南京建爲國都。

太平軍起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壯大的農民起義。民衆熱烈參加起義軍。一八五三年太平軍進距北京不遠，滿清皇朝感到瀕于滅亡了。

使政府軍不斷遭受到慘重的失敗，農民的鉅大成功是由於太平軍推行的政策博得了廣大羣衆的同情。太平軍進行的鬥爭是要推翻爲中國人民所憎恨的異族的滿清皇朝和長期的封建剝削。太平軍在佔領新的地域時，就取消土地冊籍，將奪自地主和寺廟的土地分與農人，沒收富人的財產散給貧民。在太平軍頒佈的農業法規（編者按：即天朝田畝制度）中說：「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這樣，在太平天国內勞動人民可以得到土地。法規中又說：「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因此未被太平軍佔領的各省農民，聽到了他們的口號，即從事起義，使太平軍易於進展。太平軍推行了另一進步的計劃——制定婦女平等取締奴婢，禁止買賣鴉片等法律。他們革除舊政，拔擢官吏，改良司法，廢止拷打，嚴懲搶掠，禁娼禁酒。

太平軍予封建制度以嚴重打擊，只是不能取消封建主義。太平軍的城市裏，建立了勞動服務制度，廢止貨幣，供給居民以一切必需品。儘管頒佈了法律，貨幣仍然存留，商業發展了，產生了簡單的商品經濟。

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來挽救滿清王朝的顚覆了。他們懂得中國起義農民的勝利威脅到不列顚帝國本身的存在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東方的殖民利益。

俄國著名作家龍查羅夫在一八五三年就預言過，太平天国起義「就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國和美國感到的，像是地震般的打擊」。（龍查羅夫著「帕拉德號戰船」）

實際上，太平天国起義開始之後，印度就發生起義（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反英的人民起義），威脅到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資本主義的英國特別重視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戈登的功績，以至在他的墓碑上刻著「拯救不列顚帝國的戈登」，就是這個緣故。

× × × ×

十九世紀中期是英國經濟繁榮的時期。英國成爲全世界的製造廠。英國商人尋找國外市場，注意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就想在這個國家裏大量出賣自己的商品。英國商人們的興趣不僅將工廠出品輸向中國，主要地是要出賣鴉片。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於一八四二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只滿足了希望中國門戶可能開放得更寬的英國的部分要求。因此英國資產階級在太平天国起義之初採取了觀望的中立地位。英國打算利用中國的內戰來推廣自己在該國的陣地。不過她還不知道何方勝利，不知道太平軍對國外貿易的關係如何。除此之外，英國資產階級不滿於阻碍外國資本深入中國的滿清政府的政策。英國希望滿清皇朝由於起義運動發生而削弱，很快對外國資本主義作新的讓步。

我們已經說過，太平軍佔領了國內最富庶的省份，那兒出產茶和絲。長江流域的稠密人口可以購買大量的英國商品。爲了要明瞭太平軍對外國人的關係，英國於一八五三年四月派遣以英國香港總督文翰爲首的特別外交使節到太平天国。他正式通知太平軍，在太平軍對滿清的鬥爭中，英國遵守中立。

自命爲「洋弟兄」的英國人，從太平軍那裏尋求在中國的貿易自由和航

行長江的權利。獲得了這樣的許可，英國人在太平天国的全部領土內即可以進行貿易。文翰在南京之行以後，其對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樂觀地估計英國對華貿易的遠景。從英國國務大臣克拉林頓給駐俄公使塞木爾的電報中，明顯地看出這一點：「由文翰指出了有利用中國所遭受的危機之可能，以便在國外貿易的發展中，在具有光明前途的市場上獲得更多的特惠」。（蘇聯外交部編俄國外交文獻）

俄國駐北京的代理公使巴留哲克【註一】報道關於太平天国起義初期英國的政策說：「英國的代表看到條約實行之後經常遇到中國政府方面的阻碍，看到領事官對於地方政府嘖有煩言、無有休止，開始不干涉中國內部的衝突，認為有與叛徒進行交涉之可能，因為住在叛徒中的新教徒給予了這樣的希望。此外，歐洲輿論對於太平天国是贊成甚於反對」。（俄國外交文獻）

不過英國很快破壞了自己維持中立的諾言。從加法羅夫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英國行駛長江的砲艦在一八五三年就已經對滿清予以幫助了。在上海以及在其他沿海城市，英國干預了太平軍與滿清間的軍事行動，不讓太平軍通到海邊，復允許滿清在英國旗幟掩護之下從江上輸送軍隊經過為太平軍所佔領的城市。在英國還不曾使滿清投降，還不曾在北京樹立自己的傀儡——恭親王的時候，這一切敵視太平軍的行動只不過沒有大規模性質罷了。

× × × × ×

在對俄戰事終結之後（一八五三年——一五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英國於一八五六年進行了對華第二次的軍事侵略。英國對華第二次的所謂「鴉片戰爭」延續到一八五八年五月。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全部中國為英國貿易而開放，是要鴉片進口得到合法化，是要將北京政府置於自己勢力之下。這次戰爭裏，英國獲得了法國和美國的支持。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毫無武裝的中國新的失敗而告終，一八五八年締結了天津條約。這個條約允許英國在長江和華北口岸進行貿易，以及鴉片入口的合法化。

俄國的外交家普提雅廷【註二】分析天津條約，得到結論是：英國馬上要改變對太平軍的關係，轉而對滿清皇朝予以積極的支持。一八五八年十一月，普提雅廷從巴黎寫給外交部的文件說：「英約內的條款，規定長江沿岸於內戰終止之後，沿長江帝國內部航行的開放，明白表示了英國內閣著意要居中鎮壓叛亂，在中國最富庶的工廠區內，這一亂事現在是英國擴張商業的唯一障碍了。北京朝廷要平亂，以自身的力量久而無功：自願地或非自願地會要讓英國人參預。」（俄國外交文獻）

天津條約締結之前，英國資產階級中間已經大聲疾呼，要求英國在華放棄觀望的政策，轉而以堅決行動支持滿清。當時印度發生了反英的人民起義，在印度刊行的英國報紙倡這種論調的特別多。英國資產階級為亞洲發生的民族解放運動所駭倒了。英國資本家相信中國偉大的農民戰爭不僅震撼了滿清的制度，而且也引起了印度的響應。和以住在印度的英國商人以大量鴉片輸入中國，他們久已不滿於中國的禁烟了。天津條約之締結，給予英國商人以自由運輸鴉片到中國的權利，因此他們非常滿意。

天津條約締結之後不久，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英國船就轟擊為太平軍所佔領的若干城市。不過英國人不忙於對太平軍開始大規模的敵對行動，因為天津條約還不曾由清廷批准。

一八五九年，該年內應批准天津條約，英國又復對華開戰，希望整個地奴役中國，把滿清皇朝置諸自己的勢力之下。伴隨英國對華第三次戰爭而來的是新的野蠻的英法軍隊。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八日，巴枯寧從伊爾庫斯克發出致赫爾岑的信，是在剛從中國返國的伊格那提業幅【註三】所說故事的印象之下寫的，說：「您沒有從報紙上知道嗎？英國的，尤其是法國的軍隊是無比的野蠻。其中首屈一指是由印度土人兵組成的軍隊，最多的場合是從事刼掠，次之是純血種的法國兵，在到北京之前沿途強姦婦女，姦淫之後把她們淹死」（巴枯寧書簡）。

一八六〇年秋，滿清皇朝的命運被決定了。英法軍隊佔領天津，走進了北京的大門。咸豐帝由京出奔熱河。聯軍佔據藏有珍寶的夏宮，加以搶刼。英法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其中要求賠欵，給英法以駐軍天津的權利，割讓北京，批准天津條約和燬平皇宮。英國人提出了這樣的最後通牒，故意散播謠言，說：假如不接受最後通牒，他們要推翻滿清。英人意欲恐嚇清廷，使之投降並簽訂賣身的和約。

恭親王被派為滿清政府的全權代表與聯軍談判，接受了聯軍的最後通牒，對英法軍開啓北京城門，與之簽訂所謂北京條約。中國批准天津條約，此外對英法賠欵各八百萬兩，同意割讓九龍半島於英國，開放天津為商埠。儘管滿清接受了最後通牒的基本要求，聯軍仍然焚燬了夏宮。額爾金爵士【註四】却說要在中國人腦袋裏留下「必要的印象」。

英國人要滿清政府讓步，屢次威嚇它，要把中國分裂成兩國，要使滿清政府和太平天國政府並存。

俄國派往中國的特別外交使節的首席伊格那提業幅對中英第三次戰爭前夕的英國政策作了如下的估計：「額爾金認為假如太平軍領袖能避免分裂的危險，遲早必會勝利……英國使臣駐於北京及英國公民有權利往來中國內地各省，尤其是南部各省，完全必要。對北京政府應該訴諸第三次戰爭來達到

這些目的……破壞中俄間的親密關係和協調，完全必要。爲英國在亞洲的競爭對手的唯一歐洲强國與中國之間，英國使臣應該極力挑撥。俄國人一旦接濟叛軍以武器和輪船，或在中國組織歐洲式的軍隊，如像他們已經打算要做的，那末人口衆多的中國在東方就成爲一大危險勢力，不獨可以抵抗英國，而且可能侵入印度」。（「關於一八五九——六〇年伊格那提業幅旅華的資料」）

不過英國放棄了分裂中國爲兩國的思想，因爲害怕在這樣的情形下會加强俄國對中國的影響。英國人予滿清以致命打擊，可是並不推翻滿清皇朝，以便能爲所欲爲，因爲滿清是爲中國人民所痛恨的。英國意在使滿清完全投降，使之聽命於已，並削弱俄國在中國的勢力。

× × × × ×

北京條約締結以後不久，英國就與滿清聯合起來，對北京政府的政策開始給予强大的壓力。親近外國資本家的黨派被扶植執掌政權。恭親王作了外交首長。

恭親王得到英法外交使節的支持，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發動政變，攫取政權到自已的掌握。實際上政權是由英國人授與的。恭親王設立了外交部（譯者案此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整個國家完全就聽命於英國人了。恭親王派英國人李泰國爲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這表明了出賣全部海關置於英人支配之下：「關於關稅管理，李泰國從不曾報賬，當中國人問到的時候，經常就說他們絲毫不懂他的賬，因此也就無賬可報」。（俄國外交文獻「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駐北京代辦格林克公牘）

恭親王的全部政策都朝向完全滿足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要求。恭親王正是倫敦，巴黎和華盛頓久巳夢想的傀儡。

英國對太平天國「嚴守中立」的聲明只不過遮掩了她對中國農民的敵對行動。實際上，一八五三年在上海和法國人共同參加鎭壓「小刀會」的起義，英國就已經破壞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諾言。一八六〇年當太平軍進攻上海時，英國又復破壞對太平軍的諾言了。

南京條約締結之後，上海成爲外國資本家重要的據點。英國人久巳重視上海有利地位，位於長江之口，鄰近大運河，中國的一切商品差不多要經過那兒。他們懂得誰能控制長江，誰就能佔有中國的心臟。英國人在上海長期租借了大片土地。美國人和法國人得到了若干較小的地區。這樣在上海建立了三個外國租界。外國重要的商行和銀行等等都在這兒。全中國最重要的上海海關被英國人攫取了。它給予他們很大的收入，因爲從各國來到港口內的船隻很多。上海是英美法各國軍艦停泊的處所，無數的外國軍隊集中在這兒。滿清感到上海危急，他們從這兒要攻擊太平軍，就是這個緣故。英美法各國船隻從上海開到長江，予滿清以援助。

雖然太平軍公告中表示採取必要措施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雖然表示凡對外國人加以若何侵犯者要受到懲辦，卜魯士【註五】却表示不讓太平軍來到上海。太平軍的回答是他們要繼續進攻，因爲清兵在上海無時不威脅到南京。上海爲清軍到長江上游開闢了道路。

一八六〇年太平軍攻近上海了。雖說他們對外國人不曾開放一鎗，可是英美法各國的砲彈却落向他們；英國的戰艦從黃浦江射擊他們。英國船隻的砲火燃燒在上海的附近，採取攻勢來阻止太平軍。「叛軍只決心攻打中國城市——法國駐華使夫人寫道——他們開始要攀登對岸的城垣，藉我們助力的滿清步兵打退了他們。英國砲艦隔河轟擊，這樣才使叛軍退却」。（布爾布隆夫人中國雜記）

英美法各國在上海發生軍事行動的同時，英法聯軍向華北作戰（第三次鴉片戰爭）。因此當時英國和法國在上海區域內對太平軍不能發動大的戰爭。滿清投降之後，額爾金致函恭親王說：「只有外國軍隊在上海才能阻止太平軍攻下城市，假如滿清不接受英法的要求，那末，後者將軍隊撤離上海，城市就要入於太平軍之手了」。（墨爾特瓦果著「一八六〇年歐洲人對華海上關係與戰爭概要」）

一八六〇年由美國人組成的外國志願軍參加對太平軍作戰，在鎭壓太平國起義之中，以聞所未聞的殘酷著稱。上海地域內，英美法各國參預軍事行動使三萬中國農民犧牲了。俄國外交家縫紹羅夫從上海寫信說：「上海如無歐洲人，此地當已入於叛軍之手」（俄國外交文獻）。

在上海血醒鎭壓的消息傳到英國，引起那兒輿論紛紛的反對。不過巴麥斯頓絲毫不爲所動，派遣了駐北京公使卜魯士去嘉奬上海的兵士。

英國表示不容太平軍重新進攻上海。太平軍應允在一年之內不接近上海。其英國船繼續經過南京在長江上替清廷運輸滿清軍隊，武器和砲藥，英國商人將軍械售與滿清，在上海開始公開應募到滿清軍隊裏去。英國殖民家的氣燄與日俱增。

北京的政變結束之後，一八六一年十二月英國由海軍上將何柏要求太平軍不得進入上海及其他「開放口岸」一百華里以內，以便太平軍無從搜索英國船隻。太平軍拒絕了這樣無理的要求，因爲英國人提供自己的船隻給滿清，滿清又從「開放口岸」攻擊太平軍。太平軍不顧英國人的威脅，一八六二年初對上海採取了新的進軍。干涉者和滿清合力射擊他們。干涉的新階段開始了。

爲了要從「嚴守中立」的政策轉向大舉公開干涉，須得武裝英國輿論以反對太平軍。爲了這樣的目的，英國刊物中時常出現煽惑性的文章，責難太平軍的强暴野蠻等等。這次反對太平軍的戰爭中，首先是傳教士參加。不久之前，他們尙稱太平軍爲正統派基督徒，可是現在開始責備起義者的信心不虔了。在英國議論紛紛，特別是關於太平軍似乎要阻碍通商。國會內提出長江貿易情況的「藍皮書」，對太平軍充分加以誣蔑。「藍皮書」的目的在於證實太平軍破壞商業和交通的罪惡，製造在華大舉干涉的輿論。實際上，干涉中國內政的外國應負使中國經濟情況惡化的全部責任。

馬克思在「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一文中說：「當然，停泊在中國水面上的英美法各國艦隊都不能貢獻保證採茶的辦法，它們的干涉却可以造成莫大的糾紛，足以破壞國內產茶的中心與輸出茶葉的海港之間的一切交易。」馬克思直截指出：「在現在的時候，西歐列强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帶有暴力的性質，並使商業停頓」。（用解放社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譯文——譯者）這樣一來，中國通商感到困難，罪戾不在於太平軍，而在於列强以「通商秩序」干預中國的內政。

在中國大規模干涉行動開始之後，太平軍都不曾妨害外國貿易。爲了保證外國方面的中立，他們沒法不使外國有干涉中國內政的口實。文獻否定了太平軍有破壞商業之罪。太平軍的敵人想出這種煽惑性的斷定，成爲大規模干涉組織反對太平軍的重要理由之一，而眞實的原因如下：

英國使滿清戰敗和投降之後，扶植自己的傀儡掌握北京的政權。爲了牽制他的政權，必得鎭壓太平天國起義。滿清締結的條約，給予英國人以大量權利，在華鴉片進口成爲合法，當時太平軍繼續阻碍爲英國在華進口最大部分的鴉片貿易，繼續威脅上海，而英國人係經過上海向全中國進行鴉片貿易。

英國資本家亟欲迅速深入長江流域，只有在太平天國起義被鎭壓下去的情形下，他們才能在那兒進行貿易。（天津條約第十條內已由滿清預見到這一條件了）。

太平軍阻止中國成爲附屬於外國資本的國家。他們進攻上海和其他「開放口岸」。太平軍志在取得開放口岸，及許多省內反對外國强盜的運動，都使英美資產階級相信一旦太平軍勝利，要使中國成爲外國資本的殖民地，即無可能。英國資產階級在在中國農民面前大爲震駭，害怕中國農民和封建主義進行着鬥爭，目標也針對着外國强盜。

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發生了中國農民反對外國資本的運動。一八六三年，直隷省發生嚴重騷動。排外運動不顧鎭壓，很快就轉入城市：「直隷省許多城市出現了標語傳單，號召人民殺盡外國人」。（俄國外交文獻「富藍加爾私人信件」）中部南部各省人民對於具有敵意的外國人則加以監視。

太平軍奪取上海的企圖引起英國資產階級很大的驚惶。「商人們希望把上海變成英國的殖民地……使英國製造品氾濫於中國。這就是英國人對上海的看法」，駐北京俄國代辦這樣報告。（俄國外交文獻「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駐北京格林克代辦公牘」）。「上海對於英國人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城市——駐北京俄國公使說——當叛軍佔領蘇州，接近上海的時候，引起了歐洲人的驚恐，駐紮在那兒隔離叛軍地區三十英哩的英國皇家軍宣布：他們要以武力阻止叛軍前進」。（俄國外交文獻「富蘭加爾公使公牘」）

干涉者利用了一部分英美法聯軍，那是參加過第三次鴉片戰爭，停留在中國以便保證中國履行北京條約的。此外在印度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起義失敗之後，英國能够從印度派遣一部分軍隊到中國來鎭壓太平天國起義。

英國資產階級害怕太平軍的勝利影響到整個亞洲的情勢。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馬克思就預見到起義要影響到英國本身。一八五七年在印度的起義，無疑地是中國偉大農民戰爭的回響。加法羅夫的意見認爲太平天國起義成功足以引起整個亞洲的革命。

首先主張對太平軍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卜魯士，其主張的依據就在於起義的勝利足以打擊英國的對華侵略。他說：至於太平天國起義的發展，打銷了大不列顚建基於對華條約所得的商業關係和利益。這樣，英國在華如願已償的當時，太平軍是中國降於半殖民地途中的唯一障碍。入口的英國工業品下降了。北方與南方之間的，各省與外國資本家以之進行對華侵略的港口之間的商業聯系，爲內戰所破壞了。華中各省經過多年戰爭，經濟枯竭，人民遭受到糧食的困難和飢荒。白銀被收藏了，也不够支付外國商品。大部分白銀集用以償付鴉片烟價。中國市場的縮小，是使英國改變對太平軍關係的主因之一。因此馬克思說：「可是如果有一個大市場忽然縮小，則危機之到來必然加速。而現時中國的起義，對於英國正有了這樣的影響」）。（「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

太平天國起義範圍的擴大及其持久的性質，中國經濟的崩潰，尤其是太平天國起義影響英國殖民地的危險，使得現在中國推銷商品的英國資本家感到不滿。國會內轟然譴責巴麥斯頓，爲了一八五八年及一八六〇年，他不攻打太平軍而要攻打滿清（柯布登演說及其他）。英國殖民家決定不再與旣存的太平天國政府妥協而要絞殺中國革命了。一八六二年二月，英國對太平軍開大規模軍事行動。（未完待續）

代郵

（一）山西大學歷史系羅元貞先生：來稿已遵囑代轉丁正華先生。

（二）蘇州章冠英同志：請示詳細地址以便聯繫寄奉稿費。

（三）常州中學祁龍威同志：您對胡華同志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意見已轉胡華同志參考。

（四）津市市立初級中學黃承漢同志：您對人民出版社所提意見已代轉該社。

（五）黎子耀同志：請示詳細地址以便寄奉稿費。

一千年來伊斯蘭教（回教）在新疆的發展

蘇北海

新疆十三個民族，其中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兒、塔吉克、回七個民族，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佔全省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因此泛伊斯蘭主義和大土耳其主義分子就大言不慚地割斷歷史說：新疆土著民族一向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如果不正視着歷史的發展，是會被反動分子的歪曲所迷惑的。可是鐵的歷史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新疆民族的信仰伊斯蘭教，祇是近一千多年來的事情。維吾爾族的全部信仰伊斯蘭教更祇是近幾百年的事。

一、伊斯蘭教傳入前新疆人民的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未傳入新疆前，從古代的薩滿教到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都被各族人民信仰過。尤其是佛教，遠在公元一世紀就在大戈壁的沃洲中佔着絕對的優勢。當八世紀阿剌伯（大食）帝國的伊斯蘭教軍力伸展到中亞細亞時，天山南北所盛行的依然是佛教。疏勒、和闐、庫車、吐魯番等地在七百多年的發展中，建立了不少的佛寺古剎，同時佛教文化也蓬勃地滲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近代經考古學家發掘，已在吐魯番、庫車、于闐、孚遠（古北庭）等地發掘出許多有關佛教的珍貴遺跡——文字、經典、雕刻、藝術；庫車、敦煌等地千佛洞中更保存着有輝煌藝術價值的佛教壁畫。當時佛教鼎盛的情形，在僧侶的行紀和統治階級的歷史記載中，也是說得非常清楚的。（註一）

大體上，經四世紀到八世紀時，塔里木盆地佛教極為興盛，其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于闐，疏勒數地尤為佛教的中心。單從西域記所述庫車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就已很清楚的說明當時佛教僧侶是在怎樣利用佛教，引導人民承受痛苦的生活，追求來世的天國樂園。

到八世紀以後，摩尼教、景教已漸興起。這些宗教主要是與一部分王公貴族發生了關係，沒有能像佛教一樣普及到人民的下層。可是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各沃洲集團自給自足的純自然經濟形態，已不能滿足於新起的商人地主階級的要求了。而佛教的本質，是一種厭世主義的哲學態度，只求對於沃洲的農業活動，能維持自給自足，維持各個統治集團間的均衡狀態。當時天山南北許多獨立國家的存在，統治階級正需要利用佛教的精神統治，一方而束縛經濟發展和鞏固統治權力，另一方面使沃洲間構成一條精神防線，連繫各國王室的感情，預防政治衝突的暗中滋長。但這種精神的聯系是靜止的、脆弱的，經不起物質的撞擊，就會被割斷粉碎。所以商品經濟一抬頭，權力較大的統治階級，自然首先要打破這種均衡的局面，以滿足他更高的享受慾。伊斯蘭教正是以積極的入世的哲學態度，强調羣的繁殖和羣的生活，牢固地在同一信仰下，團結分離着的人羣。所以能符合商人地主階級擴大權力統治的要求。

二、中國與阿剌伯在中亞的衝突

從七世紀開始，阿剌伯半島在穆罕默德領導下，經過二十三年的鬥爭，統一了阿剌伯半島各種族部落，接着以銳不可擋的力量，擴展疆土，竟及於歐、亞、非三洲。這樣經過一世紀的時間，至伍米亞王朝瓦爾德第一時，軍力更越過了阿姆河，東征花剌子模，撒馬爾干等國，並企圖進攻喀什噶爾。這時正當中國唐朝（玄宗開元中）在新疆與吐蕃交戰。而此時大唐帝國的統治基礎已呈山雨欲來的局面，所以已不能很快打敗正在革新途中的吐蕃民族。聽見中亞方面來到了一枝强大的阿剌伯軍隊，唐室就首先派了幾個使者去勞軍，並請遣使通好。當時瓦爾德的將軍屈底波，就派了十個傳教士，隨從一位天文學家到中國來，這也就是伊斯蘭教從陸路來到中國的開始。

正帶着滿帆的飽風，向着東方世界前進，不礙到一定的阻力，是決不會終止的。所以據塔巴里（Tabari）的歷史中載稱：

『西元七一五至七一七年間（唐開元三年至五年），屈底波自拔汗那越葱嶺佔領喀什噶爾，遣使貢馬於中國皇帝，令來臣服。並告知，屈底波已立誓，必踐中國土地，中國皇帝令取土一包與之，以應其誓。』（註二）

以上是回教著作家的傳說，不見中國記載，當然不甚可信，但由此可見新興的阿剌伯帝國是有向東發展的野心的。由於這種侵略野心，加上伊朗的十葉派教徒，受着伍米亞王朝的迫害，逃到呼羅珊後，仍在嚴厲的搜索。因此，他們祇好向新疆方面逃奔，尋求生路。結果，使中國與阿剌伯的戰爭首先在中亞境內展開。可是那時唐帝國對於新疆的統治，仍然還有自衞的力量，因而在怛邏斯大戰失敗以前，曾有一次打敗了阿剌伯；一次堅强的防阻了依斯蘭教軍的進攻。歷史上曾較詳的記載着那兩次軍事衝突的情況：

通鑑卷二一一於開元三年（西元七一五年）下稱：

『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張）孝嵩謂都護李休景王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西進。是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斬俘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師請降。』

這是歷史上唐與大食第一次的短兵相接，大食是被打敗了。過了兩年，西元七一七年，阿剌伯又帶領了突騎施部落進窺塔里木盆地。通鑑卷二一一稱：

『（開元五年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番謀取四鎮，圍撥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這是第二次，歷史上雖未說出誰勝誰敗，顯然進襲的阿剌伯軍及突騎施軍是被打退回去了。

經過這兩次的戰鬥，唐帝國對於阿剌伯的實力還是認識不清，仍然想運用遠交近攻的方式，進行對殖民地的統治和剝削，所以在西元七二三至七二五年（開元十一年至十四年）時，駐西域都護仍企圖與阿剌伯在中亞的殖民地將軍愛密兒．呼羅珊（Amir Khurassan）邀約共同進攻突騎施種族，沒有能實行。（註三）這正是由於阿剌伯在中亞的統治日形鞏固，用全力掃清各族的反抗力量。所以安國．康國．俱密國．石國，吐火羅等國的王公貴族階級，都以火急的表文，請求唐室出兵援助，共禦阿剌伯。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康國表文中說：『從三十五年來，每與大食賊戰鬥，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大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臣苦難。』各國都用着這樣類似的救急表文，唐朝却始終沒出兵，只是虛言安慰他們幾句。這已顯出了唐帝國統治基礎存在不穩的象徵；同時也說明了中國與阿剌伯對殖民地統治方式的不同。當時中國對各殖民地的國王酋長，是用羈縻的方法，祇是通過他們進行對殖民地人民的掠奪，他們進貢了一些東西，照樣還能得到很多珍貴的賞賜。阿剌伯的統治者對他們就完全不同了。慧超在五天竺國傳中稱：『此胡密王現屬大食所管，每年輸稅捐三千匹，住居山谷，處所狹小，百姓貧。』這樣，許多沃洲的國王感到已沒有在中國殖民官吏統治下的舒適了，裝入腰包的大大減少了，所以不得不向中國求援。

無奈唐朝派在殖民地的官吏，隨着國內政權的腐敗，也趁機橫徵暴斂。當時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對各國國王或酋長，稍有奉獻不殷勤的，就捕押起來。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竭師王等都被擒送入朝斬殺。對石國王的擒獲，則是欺騙石國國王約降的時候，進兵襲擊，不僅俘擄了石國王及妻拏、丁壯，還殺死了很多的老弱，劫走了大批財富名馬，這些還僅是封建統治階級自供出來的；那沒有自供的，以及高仙芝的將官和士卒狂妄地刼掠的，決不止這一點。怪不得石國的人民要傷心地痛哭，向阿剌伯的殖民地總督乞兵了。

阿剌伯帝國在中亞的殖民地總督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就利用這個好機會，對所屬各國統治者進行了鼓動性的宣傳。因而除了阿剌伯的正式軍隊外，還組合了與石國同血族的昭武九姓胡諸國。高仙芝聽到阿剌伯合石國兵聯合要來進攻的消息，也就急忙帶領了中國戍守天山南路的二萬多軍隊與葛邏祿、拔汗那等國異族兵四萬多人，（註四）深入中亞，在怛邏斯地方與大食軍隊激戰，結果大敗，生還的不及幾千人。這是歷史上中國與阿剌伯戰爭中最大的一次。經過怛邏斯戰役的失敗，唐帝國才眞正認識了阿剌伯帝國兵力之强，因此在七五七年九月（至德二年）安史之亂時，就不得不借大食及回紇的軍隊以勦平地方軍閥安祿山、史思明。安史之亂，雖被平定，唐室的統治基礎，却已走向下坡路。所以唐朝有事，就想勾結阿剌伯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

由此可以看出：阿剌伯帝國的東征，十葉派教徒的東逃，唐帝國與阿剌伯帝國幾次的戰爭，以及向回紇，阿剌伯的借兵平亂，打下了伊斯蘭教初步向新疆發展的基礎。

三、伊斯蘭教與佛教徒的戰爭

當中國借阿剌伯軍隊平定安史亂時，新興的奴隸王國——吐蕃就趁機伸展他的野心，攻陷了高昌和北庭。當時吐蕃的西部，就直接與伍米亞王朝及其以後的阿拔斯王朝的版圖相銜接。而自安史之亂後，唐室也已再無力繼續對西域殖民地的統治了。於是阿剌伯與吐蕃的軍隊就在天山以南展開了短兵

相接的激烈爭奪戰。

吐蕃的侵入新疆，給與了伊斯蘭教順利向東發展的極大阻力，同時也給沒落的佛教僧侶階級增添了生力軍，增强了抵抗伊斯蘭教的力量，這就延遲了佛教徒被滅亡的時間。

自吐蕃與阿剌伯展開直接的衝突後，就在西域前後紛爭了一百多年，阿剌伯在阿克蘇、喀什、莎車一帶佔優勢，吐蕃則在阿克蘇以東以北佔優勢。直至西元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七年）阿剌伯才徹底摧毀了吐蕃在新疆的根據地。這就掃清了伊斯蘭教向新疆發展的第二種障碍。

這還祇是說明了阿剌伯在軍事上得了優勢，要使人民普遍信奉伊斯蘭教，還須經過廣泛而深入的宣傳。尤其在封建時代，專制權力高於一切，如果能得統治階級的提倡，推廣起來自更會容易而迅速。維族民間有着這樣一段傳說：

『沙托克原名大倫布古拉汗，渾名大倫。十五歲出外打獵，碰見一批商隊，打開貨包，正當他看貨時，商隊中忽有一人喊禮拜，大倫非常奇怪地問，這是什麼宗教，後來他就信仰了這一個教。』

雖然這是一個傳說，但却暴露了阿剌伯的傳教士大都是充作商人進行宣傳的。也正以商品來打動王公貴族階級的心，從而王公們首先信奉了伊斯蘭教，於是就利用了他們的封建權力，强力地進行宗教的宣傳。阿剌伯歷史家衣比尼吾勒•艾提亥耳所說，於西元九六〇年（回曆三四九年），西域有一個很大信仰的改變，正是指的伊斯蘭教在維族中已經生根發芽，改變了基本的態勢。以哈拉汗國的沙托克布格拉汗爲首的宗教統治集團已經形成，從此再不必阿剌伯方面事事出馬了。

於是沙托克布格拉汗就利用他的權力，首先促使王公貴族階級信奉依斯教，接着就派人向人民宣傳宗教。不過人民對佛教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當面說信仰了，等傳教士一走，却又不信仰了。所以到了沙托克布格拉汗的孫子阿布、哈森納斯爾（**Abul Hasan Nasr**）時，就直接用兵力進攻疏勒，壓迫佛教徒，强使改信依斯蘭教。于闐王聞訊，立刻出兵協助疏勒的佛教徒反攻伊斯蘭教軍隊，未得勝利，就祇好帶着疏勒逃出來的一部分佛教徒退回到于闐去。從此，疏勒就成了伊斯蘭教在新疆的根據地。

于闐王退回和闐後，一方面積極的聯絡同教的吐蕃、回紇；一方面還屢派善名，善德，吉祥等僧侶充使節來中國，請求救助，進攻喀什的伊斯蘭教徒。因此到十世紀伊斯蘭教軍玉素普卡的引大軍進攻于闐佛教徒時，吐蕃、回紇，都因同信佛教的關係，也迅速出兵援助于闐的佛教徒，這樣就使戰爭延長了二十四年的時間。史稱：『吐蕃卽西藏人，因同爲佛教徒之關係，乃由南方助于闐。同時，回紇人自先代以來常與回教徒爲敵國，故由北方救于闐。于闐得此二國援兵，爲戰頗久。敵軍雖衆至四萬，尚不能破之。防守二十四年，終以兵折矢盡，遂屈服。國王 **Jasol khalk halu** 死，猶素夫卡德勒汗自立爲于闐王時，爲西曆一千年（或一〇〇一），故西曆一〇〇九年及其以後與中國交涉的于闐王，及其使者有回教民族之名字也。』（註五）這激烈的長期的戰爭，犧牲人數之多，留陳在今天和闐區域的塚墓，單就民豐縣因達臣麻扎附近就有八萬多個。當時戰爭的慘烈情況，於此仍可想像一二。在伽師，于闐鄉土志中對猶素夫卡德勒汗的進軍情況，說得更爲清楚：

『宋太祖開寶四年（西歷九七一年）……玉素普卡底（註六）乞兵於西國，亦瑪木（掌敎官名）於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西元一〇〇九年）自木羅奕國（又稱木剌奚）率衆十餘萬至喀什，衆復降，至索普卡底爲帕夏，亦瑪木進兵葉爾羌，葉爾羌人迎降。又攻和闐，和闐人或降或逃，因名其地爲固莽，今皮山之固瑪卽其地。固瑪言來有不來也。到和闐山隘爲敵所殲，玉素普卡底聞訊，自喀什來葬之，今于闐策勒村東之西里剌莊麻間是也。後四十年卽宋仁宗時，皇祐元年（西元一〇四九年，回曆四三〇年）玉素普卡底死，衆復叛。』（註七）

這更詳細的說明了佛教聯軍與伊斯蘭教軍戰爭的激烈，佛教徒抵抗的頑强；同時也說明了于闐雖被伊斯蘭教用武力征服，可是從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上半世紀中伊斯蘭教在于闐的統治是不穩固的。所以到一〇四九年玉素卡底死後，佛教徒又起而反抗了。中國十世紀至十一世紀的歷史記載中，對於于闐，哈密，吐魯番，庫車等地，仍都說通貢不絕，只喀什，葉爾羌二地沒提隻字。正可證明自十世紀至十一世紀時，伊斯蘭教在喀什，葉爾羌兩地的統治已經鞏固了，其他各地則仍以佛教徒的勢力爲主。

四、蒙古帝國使伊斯蘭教進一步的發展

十二世紀初，西遼在中亞及新疆建國，採取了信教自由政策，容許各自

發展，易賓愛爾阿提爾曾紀稱：

『（回曆）五百二十二年時（即西紀一一二八年）秦國（指西遼）之葛爾汗，行抵喀什噶爾，此人渾名跛子，領率軍隊甚衆，時喀什噶爾之王爲哈三之子、亞罕默德，率全軍迎戰，卒敗死……葛爾汗統治此地後，對於所征服國之行政不甚過問，於人民征稅賦亦極廉，每家只出一地納耳，對屬國諸王亦極寬和，凡其臣屬繫銀牌一個於衣帶上，表示歸順於彼即足。』

可見這時伊斯蘭教軍的發展，只是停留在靜止的狀態，僅藉熱心的宗教宣傳，繼續影響了爲數極少的一小部份人。到西遼王位被乃曼的屈出律篡奪後，由於屈出律，原信景教，後又皈依佛教，因而對於伊斯蘭教徒，採取極端高壓的政策。當他在和闐時，曾通令人民宣誓，舍棄伊斯蘭教，任選景教佛教信仰一種，並立即在一廣場召集不同宗教的教民大會，屈出律强調景教佛教教義的完善。伊斯蘭教教長穆罕默德就挺身出來和他辯論，屈出律辯不過他，惱羞成怒，大罵他並及於創教人穆罕默德。教長也毫不畏懼的回罵：『像你這樣放屁的話，是我們穆士林（註八）。最大的仇敵。』屈出律不等他說完，就吆喝綁起來，刑迫放棄信仰伊斯蘭教，不從，當場被砍殺於禮拜寺前。

伊斯蘭教徒遭受了屈出律的殘酷壓迫和蹂躪，等到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派哲別領軍二萬進攻至喀什噶爾時，宣佈信教自由時，向受壓迫的伊斯蘭教徒就響起進攻屈出律的軍隊，捉到就殺，以雪久積在心中的仇恨。屈出律倉忙的逃入巴達克山，也被哲別軍跟縱追殺了。殘殺人民的終於被英勇的人民殺死了。

到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古大帝國建立後，伊斯蘭教在新疆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蒙古帝國封派在新疆的察合台汗國，，到西元一三二五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托可樂克鐵木耳時，由原信的喇嘛教改奉伊斯蘭教，欽察汗國至第五代烏孜別克汗時，竭盡心力研究伊斯蘭教義，並對伊斯蘭教徒，給以享受免繳捐稅的優待，哈薩克族中有一句格言稱：『烏孜別克汗留下宗教。』伊兒汗國到第七代君主合贊時，就廢除汗號改稱蘇丹，並嚴令全國人民都著伊斯蘭教式的衣帽，頭上纏着白布。轄區內的猶太教，基督教教堂，則令拆毀。

信不信伊斯蘭教，決不是蒙古殖民者個人的願望可決定的，而是當時歷史發展必然脫穎而出的階級統治工具。所說伊兒汗國中合贊王拆毀猶太教，基督教教堂，那祇是偶然的現象。在新疆和中亞統治的察合台的後裔，時常徘徊在宗教信仰的十字路口，有些信仰基督教，景教，又有些信仰伊斯蘭教或首先入景教，後入伊斯蘭教，或旣信伊斯蘭教，又不忘情於基督教的。到托可樂克鐵木耳時，王公貴族以及一部分蒙古人民雖都信仰了伊斯蘭教，但伊斯蘭教如果得不到蒙古統治者的許可，是不敢干涉別人的宗教信仰的。所以伊斯蘭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仍未受到致命的打擊。新疆草原和沃洲中間，仍然還有各個宗教在從事活動，佛教也一樣還能苟延殘喘。這也說明了蒙古統治時代新疆宗教的活動，還是處於靜止狀態的，還是不完全是武力征服的方式進行的。祇是通過察合台後裔王公們的願望，逐步向伊斯蘭教方面轉移，使得伊斯蘭教的基層勢力更雄厚和鞏固。

正因爲察合台汗國統治時期，伊斯蘭教的發展基本上是在逐漸推進，所以從十一世紀起，喀什、莎車、和闐三區信教的基礎已經普通和鞏固外，其他各地人民普遍信教的時間據長春眞人西遊記中稱：『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台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吾爾與鎭海有舊，率衆部族及回紇僧衆皆遠迎。……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師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但禮西方耳。』這就道出了伊斯蘭教與佛教徒活動的分界線。所稱輪台，指的是唐朝時候的，應在天山北路，離今日迪化市西面不遠。昌八剌則在輪台西一五〇里，那末所稱「昌八剌以西已無僧，但禮西方」，很清楚的說明着十三世紀初，天山北路自今日昌吉以西直到伊犂，都已信奉伊斯蘭教了。

塔城、阿山一帶的乃曼部落在十三世紀時仍還以佛教徒爲主，間有少數的景教徒，到十四世紀時，才普遍的信仰伊斯蘭教。史稱：「一三一二年至一三四〇年金帳汗國，朮赤之孫烏孜別克稱汗時，就盡力提倡，幷嚴令人人信奉伊斯蘭教……以後就對這時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稱爲烏孜別克人，時烏孜別克汗所屬的人民，也統稱爲烏孜別克人」（註九）當時哈薩克族各部落是大都屬於烏孜別克汗管轄的。哈族內有格言稱：『薩爾睨人是另外的，烏孜別克是自己的弟兄。』可知天山北路的伊犂，塔城，喀山各區沿邊人民的信仰伊斯蘭教，到了十四世紀，已經風靡了。

天山南路呢？也是到了十四世紀托可樂克鐵木耳王信仰伊斯蘭教後，向各沃洲中派出了大批的傳教士，使阿克蘇、庫車、焉耆等地，從王公貴族到

人民，也都已信仰伊斯蘭教了。

可是十四世紀時，在焉耆和昌吉以東的迪化、奇台、吐魯番，哈密等地，却依然是極度虔誠的佛教徒佔優勢，伊斯蘭教徒祇是極少數。

五、伊斯蘭教在維吾爾族中信仰的統一

何以說，十四世紀時，吐魯番、哈密兩個盆地還是佛教徒佔優勢呢？這是有充足的歷史記載可做根據的。新元史中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稱：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再傳至薩命的斤。薩命的斤來朝，別失八里（當時畏吾爾轄地）有造飛語者，謂薩命的斤，欲盡殺奉天方教之部民，其僕訐陷官，時斐甫昌丁監治別失八里，要薩命的斤歸，詢之無其事，然其僕堅證之。事聞於朝，命刑薩命的斤誣服，乃殺之，命其弟古命的斤去代立。』

從這事就可知當時畏吾爾的統治階級還並沒有信奉伊斯蘭教，他的奴僕揭發統治者薩命的斤要殺盡伊斯蘭教徒的陰謀後，各方雖以權力威脅，他却仍然有力的證明着這事的確實性。則此一僕一定已爲伊斯蘭教徒無疑，他的同教人，也想盡方法，散佈謠言，以達到誣服的目的。從這記載，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吐魯番區域伊斯蘭教徒還是被統治的地位，並且是少數。

在一三三二年比五尼八哈石（眞淨妙惠大師）傳中稱：『師諱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其地好佛，故爲苾芻者多。』再參以近代在高昌塚中發掘出土的當時殉葬的土偶，以及元北庭故址所發現的元朝的造像碣，都足以證明十四世紀時，迪化以東及吐魯番一帶，大都還是佛教徒。

可是到了十五世紀初，吐魯番盆地的伊斯蘭教勢力已佔優勢，並當了統治者，明史火州條稱：

『火州（即吐魯番）永樂四年（西元一四〇六年）五月命鴻臚丞劉帖木兒獲別失八里，使使歸，因齎彩幣，賜其王子哈散。明季遣使貢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賈京師者，甘凉軍士多私送出境。城方十餘里，僧寺於民居，居東有荒城，即高昌故壘。』

傳中所稱的哈散是伊斯蘭教極普遍的名稱，就可知他的父親一定也爲伊斯蘭教徒，並已握了實權。象胥錄中稱：『吐魯番室居奉佛教多僧寺，有靈山十萬，羅漢涅槃處也。據其各部之史，其初莫盛佛，至明季而伊斯蘭教大盛。』明史吐魯番傳更明確的說：『成化元年（西元一四六五年）酋阿其力自稱速檀，阿力死，阿里麻嗣爲速檀。』按「速檀」即「王」的意思，伊斯蘭教徒已能自稱速檀，並世襲職位了，可見到十五世紀中葉以後，伊斯蘭教徒的勢力已由微而強而根深蒂固了。

哈密盆地也同樣的在十四世紀初，伊斯蘭教的勢力也還是微弱的。明史哈密傳稱：『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吾爾，一曰哈剌灰，其頭目不相統率。』這裏特別以信奉伊斯蘭教的回回與畏吾爾，哈剌灰分列，足證畏吾爾，哈剌灰二種人民還沒有信伊斯蘭教，頭目也不相統屬，顯然的伊斯蘭教徒還沒有佔絕對的支配地位。直到十五世紀末，明史哈密傳才稱：『弘治十八年（西元一五〇五年）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稱速檀，明封爲忠順王。』足見哈密自十五世紀末及十六世紀初，已由伊斯蘭教徒爲統治者了。

伊斯蘭教徒在吐魯番，哈密等地才得以順利的發展，與明朝統治力量無力遠及新疆也是有密切關係的。自一三六八——一六四三的近三百年中，明朝對於新疆，儘管垂涎，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伊斯蘭教自明永樂中穆罕默德二十六世孫瑪木特玉素普還居喀什噶爾傳教後，在統一的領導下，就更有計劃地以喀什噶爾爲起點。一路向莎車、和闐、于闐、遠及且末、諸羌；一路向阿克蘇、庫車、焉耆、吐魯番、哈密等地掃清佛教殘餘勢力，並進一步鞏固伊斯蘭教的統治。十五世紀（明正德年間）吐魯番蘇丹莽蘇爾征服了哈密，嘉靖年間又北向擊敗瓦剌帝國。這樣伊斯蘭教再以吐番魯爲據點，向東向北，得到了迅速發展的機會。

到十七世紀清朝立國的時候，新疆祇存在了兩種宗教勢力。除伊斯蘭教外，另一種是準噶爾蒙古的喇嘛教。那時兩種宗教勢力的分佈區域，很明顯的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全是伊斯蘭教徒，所以清朝各種記載上都稱天山以南區域爲「回疆」或「回部」。天山以北準噶爾盆地及伊犂谷地幾全是喇嘛教徒。至乾隆時「剿平」了準噶爾蒙古，把吐魯番、烏什等地的維吾爾農民，大批的強迫移到伊犂河流域墾種後，伊斯蘭教在天山以北才又恢復了瓦喇帝國興起以前的態勢，即從迪化以西各縣中，逐步都散佈了伊斯蘭教徒。天山、阿爾泰山的東部區域中，哈薩克族人也在迅速的向東佔有了蒙古人的牧地，因而從平原到草原，伊斯蘭教徒也已佔了壓倒的多數。

註一：參看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等
註二：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註三：全唐文卷二八五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註四：白壽彝編著中國伊斯蘭史綱要參考資料「怛邏斯戰役及其影響」一文
註五：日人掘謙德著于闐國考漢譯本
註六：即猶素夫卡德勒汗
註七：李晉年作回敎入新疆考
註八：穆士林即信仰伊斯蘭教的教徒
註九：尼合米特、明建能著蘇北海譯哈薩克族歷史（上海版瀚海潮月刊）

國賊蔣介石做交易所經紀人的罪證

陸丹林

國賊蔣介石出身於鹽商吸血鬼的家庭，也受過「流氓」、「暗殺兇犯」的訓練，更「對於投機的奧妙，了解得非常透澈」（蔣委員長革命史）一九一三年他的師傅陳其美垮台後他即在上海「徹底做一個放蕩的人」，那時他的一羣好朋友是「陳果夫（陳其美之姪）、張靜江、戴季陶等交易所的經紀人，他們一同在交易所裏『搶搶帽子』，撈一把嫖賭本錢，交易所的買賣，純然是買空賣空、投機、造謠、欺騙暗算、誘惑、耍流氓、冒險殘酷……總之，為了自己發財，不惜多少萬人破家蕩產，蔣介石受了這種充分的訓練，學通了交易所全部發財的鬼計」（榮孟源：國賊蔣介石）因此，經過了一年之久（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結局賺了一百萬元」（蔣委員長革命史）蔣介石在這期間盡性的發揮了他的「剝削天才」，「周旋商場，無不中的，」不久便「儼然富商矣」（秦瘦鷗：蔣介石傳記）。雖然那時蔣介石和他朋友們的財富和以後比較起來「是氣微不足道」（中國四大家族），但是可以知道他們的這種經歷是引導他們後來所走的政治道路（但並不是說是決定條件），因此在下面揭露當時蔣介石和他的一夥徒黨在上海作投機商業的罪證仍然是有一定意義的：

原來以國賊蔣介石為主在上海所進行的商業投機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牌號叫「恒泰號」，營業範圍，以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二項為限。資本總額是上海通用銀幣三萬五千元，

的陰謀分子」。（新民主主義革命史）

這羣以蔣介石為首的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商業投機者，此後在革命陣營中，不斷的進行種種陰謀，在第一次大革命勝利進行中他們叛變了革命，勾結了一切反革命的勢力，組成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中國人民進行了二十來年殘酷的統治。直到解放戰爭全面勝利，這一撮反動分子才被趕出了中國大陸，而走向滅亡。

附影印「恒源號」合同原件及原文

立合同契約 吳儁記 王愼記 吟香記 劉儼記 張瑩記 吳子記 蔣偉記 陳明記 朱守記 張靜記 吳吉記 小恒記 邱成記 張弁記 張秉記 孫棣記 王樸記 今因意旨相合集合資本經營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之經紀人事緣立此契約以資信守議定條件如左：

一，牌號定名為恒泰號，經紀人由張秉三君出名。

一、營業範圍暫以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二項為限。

一、資本總額計上海通用銀幣三萬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一、占股數目計三十五股吳儁記一股，吳子記三股，吳吉記一股，孫棣記二股，王愼記一股，王樸記一股，蔣偉記四股，小恒記二股，吟香記一股，陳明記一股，邱成記一股，劉儼記三股，朱守記一股，張靜記五股，張瑩記三股，張秉記四股。

一、本號股分得以現欵七成有價證券三成充之有價證券之種類及價格標準均照交易所規定之代用品為限。

一、本號股本現欵以長年一分計息每於常會時分送各股東其餘有價證券利息由本號代收交還於各股東。

一、本號各股東不得以恒泰號之資本經營其他事業。

每股一千元，共分三十五股。股東共十七人，股東的名字，多不是眞名。股東和占股的數目如下：吳僑記一股、吳子記三股、吳吉記一股、孫棣記二股、王愼記一股、王楧記一股、蔣偉記四股、小恒記二股、吟香記一股、陳明記一股、邱成記一股、劉儷記三股、朱守記一股、張弁記一股、張靜記五股、張瑩記三股、張秉記四股。

在這些「股東」中：蔣偉記就是蔣介石，當時簽字是「中正」二字，小恒記是戴季陶的化名，陳明記即陳果夫，吟香記即資產階級周佩箴、張靜記就是張靜江。張弁記是張弁羣，即是張乃燕的父親，與張靜江是堂兄弟。朱守記即朱孔陽、吳子記即吳嘉謨、吳吉記即吳潔忱、孫棣記即孫棣三、王楧記是王子新、王愼記即王子恒、邱成記即邱成鐸、張瑩記即張望徵。都是蓋章的。股東中以張家的叔侄兄弟占股最多，共計十三股，佔全部資本三分之一强。

張靜江、張弁羣、周佩箴、孫棣三、朱孔陽等都是江浙的資產階級，蔣介石、戴季陶、陳果夫就是和他們勾結在一起，來進行投機事業的。

蔣介石做交易所經紀人的時候，正是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等人通電重開廣州政務會議，反革命政學系岑春煊下台。蘇聯向我國政府聲明根本放棄前俄政府與中國訂立一切條約。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前夜。而蔣介石對此毫無感覺。雖然孫中山想找他去廣東却被他拒絕，他甘心在上海，做他的投機生意。「但是好景不常，一九二二年上海交易所發生了不景氣風潮，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虧空了一百多萬，在上海站脚不住，只好到廣東去『革命』」（榮孟源、「國賊蔣介石」）。而蔣介石既失去江浙財閥的靠山，自己也經營失敗「於是請了一次賴債酒」，答應「來生變牛變馬」，便帶著妓女陳潔如「南下革命了」（蔣黨流泪）。成爲「躲藏在當時革命陣營中

一、本號推定張秉三君爲經理。
一、本號辦事人員除代客經手買賣外自身不得做分文之買賣並經營其他類似之營業。
一、每年開股東會二次定陽曆一月十日七月十日由經理人召集之。
一、本號遇有擴充營業添加股本時應由經理人召集全體股東開臨時會議決定之。
一、各股東得委任代表出席於股東會議以持有股東之委託書者爲限。
一、股東中如無意營業欲將所占股分出讓時應儘先讓渡與原有各股東否則其受讓者須得全體股東半數以上之同意。
一、營業之盈虧按股匀派之。
一、營業損及資本總額至半數時應由經理人召集全體股東會議如欲繼續營業當加足資本之原額。
一、營業之純益金每遇常會期作百份分派以二十份爲公積金以十份爲全體辦事人酬勞金以十份爲經理人酬勞金餘數按股匀派。
一、前項公積金每二年分派一次總計十成開派股東及全體辦事人各得五成但辦事人中途休業者不得享有分派公積金之權利。
一、股東繳納資本時應有經理人出具收據載明現款數目及有價證券之種類數目股東如欲掉換他種證券時須將收據交納更換新據。
一、此契約成立於上海租界一式十八紙各執紙外其他一紙保存於恒泰號。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立合同

吳僑記（印）
吳子記（印）
吳吉記（印）
孫棣記（印）
蔣偉記中正
王楧記（印）
小恒記（印）
王愼記（印）
吟香記（印）

陳明記（印）
邱成記（印）
劉儷記（印）
朱守記（印）
張弁記（印）
張靜記（印）
張瑩記（印）
張秉記（印）

人物討論

史可法是否民族英雄？

——課堂討論的總結——

羅元貞

關於史可法是否民族英雄這一問題，就像我們剛才所討論過的一樣：

第一，史可法活動的時代，中國有三大勢力存在着：一、農民起義軍及李自成張獻忠兩大政權；剛興起來的滿洲奴主貴族政權；腐朽的以崇禎帝爲首的明朝地主階級政權。是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着的時代。（兩種矛盾，在發展中，先後成爲主要的矛盾）

我們的立場，應該站在農民及農民起義軍方面。

明朝，代表着任意兼併，任意壓榨屠殺農民的地主階級反動政權，是人民痛苦的來源，是社會發展的障碍，被農民起義軍推翻了，完全是應該的（只有地主階級才對崇禎帝同情）。

滿清是中國的兄弟民族的政權，擺脫明朝的統治，是對的，但後來屢次侵入長城，掠奪人畜，最後，乘機從農民軍手中奪取了北京，建立了統治全中國的「民族牢獄」，這一政權（指清朝，不是滿族全體），是中國的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民族敵人。

第二，史可法在這樣的時代，所作何事？他對農民起義軍是什麼態度？正如明史可法傳等所記載的一樣，史可法一生在消滅農民起義軍，崇禎帝自縊後，史可法更憎恨起義軍，認爲農民起義軍是他們的唯一仇敵，更要徹底消滅，以報其「君父大仇」。同志們！史可法的地主階級立場是這樣的堅定，我們能馬虎麼？

他對滿清統治階級又是什麼態度？從他中進士做大官以起，清軍曾五次侵入京畿，蹂躪直隸山東，而史可法沒有起來抗戰。一六四四年，多爾袞佔據北京後，史可法却詞意懇切地請求與滿清合作，共同消滅李自成等起義軍（見史可法答多爾袞信）。他所管的「四鎮」有二鎮也寫過同樣意思的信給多爾袞及大漢奸吳三桂。【註一】

史可法請設四鎮，主要目的，不是抗清，而是消滅農民起義軍，明人著的「揚州變記」，可以作證。【註二】

四鎮之一的高傑，離徐州，入河南睢州，這「北上」，並不是要去抗清，而是因爲高軍「淫掠久著」，受到揚州徐州人民的攻擊，想另找一個地方。「青燐屑」所記的災異，即是躲避天怒人怨的意思。【註三】

高傑到睢州，即被許定國謀殺，根本也沒起抗清的作用。即使不被謀殺，這個壞蛋也決不會抗清的。劉澤清劉良佐二鎮，不久都投降清朝了。

史可法身爲四鎮主帥，先約民族敵人滿清合作，以後長期間亦無積極的抗清行動。直到第二年四月，清軍直抵揚州城下，他才被動地堅持抵抗。但他是在失敗主義與絕望思想中，無可奈何地應戰的。實際對國家民族，對福王政權，都沒起多大作用（但當時略有振奮人心的作用）。

以上說明了，史可法對民族敵人、大明敵國（滿清），曾切望合作，好消滅農民起義軍；這一屈膝（妥協），被滿清拒絕之後，他仍沒有主動地抗清；直到清軍南下，他部下才略作抵抗；敗退揚州，城破，他才以一死了事，自全名節。而他對農民起義軍的剿殺政策，則始終如一，不顧放鬆一步，當民族鬥爭那樣尖銳的時候，他仍堅持聯外平內，這樣的史可法，是民族罪人，決不是民族英雄。

史可法是人民的死敵，決不能成爲民族英雄。

最後，史可法拒絕滿清的招降，堅決求死，表示了一點氣節，比吳三桂是勝了一籌，還算是明朝的忠臣，比起馬阮等閹黨來，也算是地主階級的正派人物，如此而已。

末了，再對幾個問題，略作補充解釋：

（一）有人說，批判歷史人物，要看他的行動是否對當時的人民與民族有利益。在歷史上起什麼作用。我說：這原則是對的。

他說，史可法在河北抗清，死守揚州，對人民、民族都是有利的，否則福王早站不住了。所以，史可法是民族英雄。

我說：明末，農民起義軍有了很大勢力，代表着多數人民的要求，民族鬥爭也日漸嚴重，爲人民、爲民族，就應當聯合起義軍共同對抗滿清。然而史可法一心一意用力消滅起義軍，對民族敵人反而妥協，要求合作，這於誰有好處？而且，對最後死守了一下揚州，不能等於爲民族抗清。清軍約一年才到揚州，也並不是因爲史可法在鎮守，而是，一

而李自成尙有很大勢力牽掣著淸軍，一面在進行分化招降。

其次，福王政權亦不値得重視，第一這是不抗戰的地主階級的偷安政權；第二，這是上下荒淫作惡，盡力剝削人民的反動政權。我們首先不要誤以這個政權爲正統。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的人，才以福王政權爲正統，對農民政權，熟視無睹。

（二）有人說，批判歷史人物，不能拿現代的尺寸來衡量古人。馬列主義者進行批判，應該不離開時間、地點、條件。我說，這都是對的。

但是，如果看到史可法在揚州不惜一死，便以爲他是民族英雄，那就錯了。因爲，我們必須全面地觀察到，他處的是什麼時代？他一生主要做了什麼事？他對農民起義軍的態度辦法，如何？他對滿淸的態度辦法，又如何？

當時各地很多和起義軍合作的明朝大官，例如河南總兵陳永福，大同總兵姜瓖；滿淸入關後，又有和起義軍聯合抗淸的湖廣總督何騰蛟與西南的桂王政權（聯合李定國等收復過大片失地）。所以，我們要求史可法與起義軍合作，並不是用現代的尺寸。

當時英勇抗淸，慷慨就義的人民，各地都很多（例如揚州江陰嘉定），史可法根本不配和人民相比，這且不提。即如明朝的大官，堅貞不屈，慷慨赴死的，亦很不少，例如：四明王翊，浙江張煌言，福建黃道周，桂林瞿式耜等等，江陰典史陳明遇，且眞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又那裏比得上這些人！我們不應看到史可法不惜一死，就五體投地崇拜起來。

在同樣的「時間地點條件」之下，同樣的地主階級智識分子中，很多人都高出於史可法之上，爲什麼獨守舊說，只以史可法爲民族英雄？他又有什麼理由配當中國的民族英雄？

如果抽象地，強調時間地點條件及階級性的限制等等，就會犯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會失掉立場原則，而過分原諒古人。

必須站穩立場，佔有全面的材料，實事求是，作出論斷。

（一九五二年，於山西大學）

（註一）：

在史可法的聯敵國滅「逆賊」的政策影響下，他所置的江北四鎭，就有二鎭主師，寫信給淸朝，更無恥、更露骨地表示投降：

其一，高傑，致淸肅王書說：「惟以殺闖賊報國仇爲液，貴國原有其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明季南略卷七）

其二，劉澤淸，致吳三桂書說：『澤淸曾有成議，約請淸王入駐內地，共圖滅闖。今親翁此舉（吳三桂迎淸軍入關）正與初議暗合也。……何難彼此分合奇正直搗闖窟。……』（歷史博物館叢刊第一年第二冊）

劉澤淸又有致洪承疇信也說：『此後滅闖復仇，一番大舉，全在和合，方好夾擊。……俟劉滄之約將期，澤淸與督師閣部道降（可法），應親行盟會市境，而決定策。』（同上叢刊）

南京福王政權所派議和使者，其中陳洪範、馬紹愉，都有信致吳三桂。陳洪範信說：『兩國通好，同心滅賊』。馬紹愉信說：『訂盟和好互市，將前年之局結了，便是叔侄之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同上叢刊）

總之，福王朝廷中，不論是馬阮等閹黨邪派，或史可法等正派，都是主張聯合滿淸勦滅起義軍的。可見，南明諸政權中，福王朝廷是最反動的，最無恥的。

（註二）：

所謂『江北四鎭』，其中高傑是李自成的叛將，其餘是明朝小軍閥，屢次屠殺農民軍的。甲申年三月初，李自成大軍自西安出發，席捲並達於河南山東等地，黃得功、劉澤淸、劉良佐、高傑，四家兵皆南竄於徐淮一帶，『劉澤淸兵在宿遷，高傑兵在徐州，俱有渡河意。二軍淫掠久著，淮揚士民危急，紛紛出城，爲逃死計。』（淮城紀事）。四家互相磨擦，又都想搶奪富庶的揚州。

史可法所倚靠的，就是這樣的軍閥們。

史可法請設四鎭，調和四鎭，督師江北，其目的，是在消滅農民起義軍。明人（佚名）著「揚州變略」云：

『（福王）朝廷旣大封四總兵爵……厚期以討賊恢復之事……

『閣部史可法與高弘圖、姜日廣、馬士英公議：江北與賊接壤，遂爲衝邊，宜於淮揚、滁鳳、泗盧、六合，設爲四鎭：劉澤淸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高傑經理河南河北開歸一帶招討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屬劉良佐；經理各轄撥剿事，屬黃得功。……』

（註三）：

明史謂四鎭惟高傑曾率師北上。今查高傑的『北上』並不是爲了抗淸，實際也不曾抗淸。「青燐屑」作者應寓居似很熟悉內幕，卷下云：

『高傑所宅徐州館舍，極其精潔，忽異物疊見，坐臥不寧。陡於白晝無因而火，高傑廁首俱焦，狼狽走出，隨身寶玩，灰燼無餘。爰是決意北征，抵睢城焉。』

高傑入睢州不久，即爲許定國所謀殺。許定國渡河北走降淸。史可法委高傑之甥李本深就其殘部，李本深率軍至大殺居民洩憤，『睢城接壤屠戮幾二百里，所至之處，飛皆刑！』（青燐屑）

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幾個具體問題

石維奎

（一）聯系和對比問題

在我們進行愛國主義當中，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聯系實際』的問題，過去有很多歷史教師，現在也有，强調在歷史教學當中『聯系實際』。如講黃巢進入長安因受城市生活影響而腐化時，『聯系』到三反運動中所揭露出來的貪污腐化的幹部；講『南宋統治階級貪污行賄時，聯系反貪污反浪費』（上海歷史研究會敎學計劃——歷史敎學十八期二九頁）；測驗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原因時，要求學生『結合自己思想來批判享樂主義、宗派主義、名利主義及農民階級本身的狹隘、保守、自私、散漫等落後性』。還有個別敎師，爲使學生瞭解封建的官制，而把封建的宰相和周總理比較。在這種陳腐的『聯系』和『對比』的教學方法危害下，不知有多少敎師給學生進行了一些機械的、荒謬的『聯系』和『對比』，把只能生產於一定社會條件下的事實、人物和思想，硬拉到現在，牽强的去加以比擬和聯系，造成一種似古非古，似今非今的反歷史主義現象。不知道黃巢的腐化，尤其是南宋統治階級的貪污、行賄和今天個別的工作幹部被拉攏而貪污腐化，根本不能相比。（目前全國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時期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薄一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農民意識，也不應該機械地和今天的青年學生思想聯系起來，人民自己的周總理又怎能和封建宰相對比？就是在職位上也不能比擬。這種不根據敎材的內容，不考慮社會條件的異同，機械地、無原則地『聯系』和『對比』是非常錯誤而有害的敎學方法。講完黃巢起義或南宋統治階級的腐化，就來一段反貪污反浪費。講完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就來一段思想批判，認爲不這樣就不能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把進行愛國主義敎育變成附加的東西或外添一段。我認爲：這樣作法不但不能提高學生思想水平，相反的是把愛國主義教育庸俗化了，當你一開始『聯系』的時候，學生便知道了：『老師又要進行愛國主義敎育了』！

但是由於過去不斷的批判生拉硬扯、牽强附會的教學方法，因而有些敎師，也可能是大多數的敎師，害怕犯錯誤而不敢聯系，甚至連敎學方法中的比較法也不敢用了。形成了一種嚴重的死守課本的現象，這也同樣是錯誤的。

那麼在歷史教學上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倒底在歷史教學上應不應該『聯系實際』？歷史事件能不能比較？我認爲：在歷史敎學中一般的來說，不應該把不同社會制度的事件、人物和思想無條件的加以聯系和對比，至於脫離敎材基本內容的生拉硬扯更是錯誤的。但是『如果這些比較是自然的、不違反科學的邏輯性，能够幫助學生更深刻地了解學習歷史事件和我們蘇維埃現實的時候，這種比較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蘇聯學生思想政治敎育」五九頁）。至於和敎材有直接聯系的一些現時性的材料（如報章雜誌），是完全可以甚至必須把它補充進來，以豐富我們敎學內容。

例如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講到滿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所訂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時，可以互相比較一下，使學生認識到：外國侵略者和滿清政府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一次比一次嚴重；在通史敎學中，講到各個朝代的農民起義時，爲了使學生瞭解：各個朝代農民起義的特點和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可以適當的比較一下。其次講鴉片戰爭割讓香港時，可以聯系到英帝國主義最近在香港屠殺華僑的罪行，以激起學生對英帝國主義的仇視。講到『四一二』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可以聯系到『五反』當中所揭發出來的資產階級五毒思想，使學生更進一步去認識資產階級的本質，但是進行聯系和對比時，『不要忘記歷史上永遠不會有同樣的事件，要比較他們就必須指出他們的特點。社會階級性質和他們所由發生的歷史背景不同』（「蘇聯學生思想政治敎育」六〇頁）。

（二）新舊愛國主義教育的問題

有些歷史教師，爲了使學生深刻瞭解農民起義領袖和民族英雄的行爲，以激起學生的愛國熱情，曾不遺余力堆積一些政治術語，去形容或描寫他們可愛和偉大，主觀願望都是好的。但是不管對於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李大釗等愛國英雄，都用同樣的詞句去描寫和形容，也就是把南宋的愛國主義，明末的愛國主義甚至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愛國主義，都加以等量齊觀是不對的。

我認爲：對於中學生尤其是對於高中學生，講授歷代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的反侵略、反剝削的行動時，應該具體的强調和肯定他那一點，使學生知道他所以偉大的地方。如講岳飛和文天祥，要强調其爲保衞民族利益，堅決抗金和守死不屈的行爲及氣節的可愛；講張獻忠、李自成，應該强調他們代

表廣大農民反對明朝專制統治的偉大行動，講李大釗同志愛國行爲時，應該說明他那種爲解放中國人民，爲解放全人類的高尙品質。這樣不但具體的說明他們的事蹟，並指出他們的階級出身，以使學生對這些歷史人物能給予應有的評價。不應該僅僅用一些空動的政治術語——如形容和描寫他們的愛國行動和精神，把革命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愛國主義——舊的愛國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愛國主義——新愛國主義混爲一談。當然我們不能因爲岳飛、文天祥……的階級出身而否定他們的事蹟和在歷史上的作用，但起碼應該使中學生知道新舊愛國主義的區別，認識新民主主義的愛國主義是新式的、高度類型的愛國主義。凱洛夫教育學裏說道：『彼得一世的歷史意義的榮譽，是由於他那旨在消滅俄羅斯落後性的革新事業而造成的，是由於他用軍事和經濟手段來鞏固俄羅斯國家威力的革新事業所造成的。由我們看來，彼得一世在革新事業這一方面是偉大，可是同時不要忘記彼得一世的事業旨在加强農奴制度和對於農民勞力的剝削』（凱洛夫教育學下册八八頁）。『這就是爲什麼要歷史和文學課比較過去的人和現在的人的愛國主義行爲和事蹟的時候，主要的要强調革命前與蘇維埃的愛國主義極大的不同，把兩者看成一樣（這是常事），只能混淆學生的認識，使他們對於蘇維埃的愛國主義不能有一個正確的概念』（蘇聯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六六頁）。

其次在通過講授中華民族反對外族侵略的歷史以進行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教育時，必須遵循國際主義的原則。不應該脫離階級關係，去强調某個民族的『野蠻』，用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思想去培養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例如有些教師講五胡亂華時，只强調匈奴、鮮卑、羯、氐、羌各族的『野蠻』，沒有交代當時的五胡已經開始過渡到奴隸佔有制。使學生認識到：匈奴、鮮卑、羯、氐、羌的外侵是各族的奴主階級，而不是各族的人民。還有個別教師講元末農民起義時，引用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謊謬例子，不知道這是剝削統治階級製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的讕調。

（三）學生年齡特徵和知識水平的問題

愛國主義教育和講授科學知識同樣，也必須是有計劃、有系統的。也就是『應該隨着學生知識水平底的擴大和加添，隨着學生逐年的發育，有系統地和不斷地增長起來，並應養成他們行爲底原則性的堅定精神。爲了這點，共產主義道德的培養，也和教學過程一樣，應該這樣地按照嚴格的制度建立起來，即應隨學生年齡之增長而逐漸地和聯貫地複雜化，……』（凱洛夫教育學下册二十二頁）。

但是現在有些歷史教師，甚至其他科教師也同樣，不照顧學生的年齡特徵和知識水平，把和教材有聯系的材料（屬於能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方面），都拉到課堂上去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例如有的教師對初中二年級，爲了使學生仇恨金元侵略者，在講受『金元統治時期經濟的衰退』時，由金、元侵略者對中國經濟的破壞講起，而聯系到中國封建社會爲什麼延續二千多年；對簡師二年級，爲使學生體會中國的偉大發明而感到自豪，在講宋朝發明指南針時，由說明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作用，而聯系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麥哲倫發現麥哲倫海角，（如果學生學過了當然可以聯系）。把低年級不能理解的，在歷史上還沒有得出定論的『中國封建社會爲什麼那樣長？』的問題以及把學生根本沒有學過的哥倫布、麥哲倫，都搬到課堂上，這樣現象是很普遍的，不論初一和高三，甚至初小，都引用同樣的材料使用同樣的方法去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但超過了兒童的接受能力，也超過了教材的範圍。不瞭解『思想、熟練的技巧與習慣的內容，應該永遠適應學校教學現階段上的兒童發展水平，逐漸和一貫地、一步接着一步地擴大和加深起來。低年級（初小——作者）、中年級（初中——作者）和高年級（高中——作者）學生的德育底內容和方法，是不能一樣的』（凱洛夫教育學下册二十頁）。

在低年級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時候，『應該從認識祖國、自已民族語言、天然富源，人民和國家的生活開始。教師的任務，在於逐漸用新知識來豐富學生對祖國的概念，以容易理解的形式，使學生認識蘇維埃祖國生活底顯著事實。經驗告訴我們：在教育低年級兒童愛祖國的時候，應該從他們所親近、直接體驗過的和他所瞭解的事實來進行，即應由兒童容易瞭解的祖國生活中的具體事實和現象來進行』（同上七五頁）。爲此要適當的利用地方風土的教材，尤其是應該注意講授的感動性。

而中年級和高年級『他們對祖國的愛是建立在逐漸形成的共產主義觀點和共產主義世界觀上。他們開始瞭解對於祖國所負義務與對於祖國命運所負責任的眞實意義，體驗到由自已人民、自已的光榮祖國而產生的民族自豪感。少年和青年的這些情感是在學校裏所獲得的知識影響下，在教師和家長，蘇維埃生活以及個人生活經驗底思想作用之下而逐漸累積起來的』（同上七一頁）。爲此對中年級尤其是高年級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與其注意講述的感動性，設與以全副精力，通過在教學過程中給學生的那些知識底思想上的堅定性來保證。

例如對於低年級學生講授抗日戰爭的歷史時，應該多講一些抗日英雄的故事，必要時也可以把楊靖宇、趙一曼……抗日英雄的照片掛在黑板上，使學生從這些直觀的、生動的現象和事蹟中，體驗中華民族那種偉大的愛國主義的精神，和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堅貞不屈的氣節。可是對中年級和高年級，如果也這樣作，不但浪費時間，甚至會使學生感到囉嗦。也就是說在中年級尤其是高年級，應該用大部時間去講授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內國際形勢，兩條不同的路線以及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正確領導。使學生更進一步認識到：抗日戰爭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勝利，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勝利。

一九五二、七、十九、瀋陽七中

中國歷史史前時期文化述要

——中等學校教學參考材料

李光璧
傅彬甫

一、我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從中國猿人到山頂洞人）

甲、人類發展的三個階段

社會發展史上告訴我們：人類是勞動創造的，人類是類人猿不斷用雙手勞動獲取生活資料漸漸演進而來的。從猿到人主要的關鍵，在於手的本身由猿的手變成了人的手，能够使用和製造最簡單的工具。從這時開始就到了人類發展史的時期。這個時期內人類的演進過程是現代人和類人猿之間的鏈索。就現在的知識可以把這個鏈索分成三個階段。

猿人階段

人類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就是猿人時期。猿人時期相當於地質學上更新統初期【註一】。由猿人化石的特徵及其生活狀況來觀察，他形體上雖然一部份像人，一部分又像猿，但已會製造粗糙的石器，並已開始用火，應該說已進入人類時期。但因他形體上大部分還像猿，所以把它叫做猿人。猿人時期在考古學上相當於舊石器時代初期，距現今約有五六十萬年。現在世界上發現的猿人化石一共有四種：（一）在我國南部發現的巨人，僅有三個牙齒，是猿人的一種，特點是巨大，比現代人約大一倍。（二）在爪哇島發現的爪哇猿人，學名爲「直立猿人」（包括魁梧猿人），特點是已能直立行走。（三）在德國海德堡附近發現的海德堡人，僅有一個下顎骨，特點是顎骨形態有些像猿，但牙齒排列和構造都與現代人相近。（四）在我國河北省房山縣周口店發現的中國猿人。中國猿人已會使用和製造粗糙簡單的石器，還能使用火。因爲發現的化石較多，所以是研究猿人時期主要的資料。

尼人階段

人類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尼安德特人時期，相當於更新統的中期。人類演變到這個時期，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像猿的性質，更與現代人的樣子接近了一步。這時人類化石在歐洲發現很多，北菲及小亞細亞也有發現，統統把它叫做尼安德特人，簡稱爲尼人。尼人已能製造及使用比較精緻的石器，住在山洞裏，以獵獸爲生。他們生存時期約在二三十萬年以前。尼人時期人類的化石，在我國也有發現，這就是河套人。河套人的化石只有一個左上門齒，另外還有三件不明地層的肢骨。

眞人化石階段

人類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眞人化石時期，相當於更新統的末期。人類形體的演進已經與現代人很相像，所以把他叫做「眞人」。在歐洲以克魯馬努人爲代表，在中國以山頂洞人爲代表。這種人類生活距現在約十萬年左右，已經能够製造和使用精緻的石器和骨器。有了彫刻和繪畫等藝術作品和裝飾品。

我們不要誤解猿人、尼人、眞人是類人猿與現代人之間的整個鏈索，這三個階段只是鏈索上的幾個環節。但從這幾個環節中，我們已經可以觀察人類在不斷勞動生產中漸漸發展的概況了。

【註一】更新統是地史學上的名詞。按地球自有生物以來，直到有了人類，地史學上共分五個時代，即（一）太古代，（二）古生代，（三）中生代，（四）新生代，（五）靈生代，靈生代又叫第四紀。第四紀分爲兩個階段：更新統和全新統，更新統約於一百萬年前開始，也稱爲舊石器時代，全新統約於一萬年前開始，文化年代爲新石器時代。

乙、中國猿人及其文化

中國猿人的發現及發掘經過

中國猿人化石【註二】發現在河北省房山縣周口店西邊一座低而圓的小山——龍骨山中。房山縣在北京西南五十四公里的地方，周口店在房山縣西邊又四公里的地方。因爲周口店距北京不遠，所以中國猿人俗名也叫「北京人」。周口店中國猿人化石產地，是一九一八年開始發現的。當時北京

政府農商部礦務顧問安特生（瑞典人）到周口店去勘查煤礦，在周口店西南三公里的一座小山中，發現了若干化石。這座小山南面因爲開採石灰已經開去了一半，北面有塡滿土石的一個大洞穴，這個洞穴就是所謂「猿人洞」，中國猿人化石及其文化遺跡，都發現在這個山洞裏。因爲在這座山洞裏出產許多大小不同的脊椎動物的化石，這種化石國藥名爲「龍骨」，所以這座小山俗名又叫「龍骨山」。

自從一九一八年最初發現了中國猿人產地之後，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奥人斯丹斯基曾在岩穴中進行採集化石工作，發現了類似人牙的化石兩枚，開始引起科學界的興趣。一九二七年採集工作由地質調查所担任，參加人員有李捷和瑞典人步林，曾發現左下臼齒一顆，據英人步達生研究，認爲是介乎「人」與「猿」之間的一種人類的牙齒化石，可以代表人類進化中最初的一個階段。把他定名爲「中國猿人」。一九二八年開始有計劃的尋找中國猿人，由步林、楊鍾健、裴文中負責。一九二九年裴文中發現了完好的猿人頭蓋骨，一九三〇年發現了猿人製做的石器（同年發現了山頂洞，但未發掘），一九三二年發現了猿人用火的遺跡。至一九三六年賈蘭坡君發現了中國猿人頭骨三個。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後，日寇侵入華北，大規模發掘工作即告停止。此後一直到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在一九四九年秋天才又開始。從開始到現在已經發掘出來的中國猿人化石，共四個完整的頭骨，十四個下顎骨，一五〇個牙齒，十塊殘頭骨片，四大塊顏面骨，十一件軀幹骨，共他還有一些殘骨片未計，據研究這些材料可以斷定四十個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的中國猿人。

中國猿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可以參看插圖一。這是根據女性中國猿人頭蓋骨塑成的。中國猿人化石究竟有什麼特點，

猿人化石特點及其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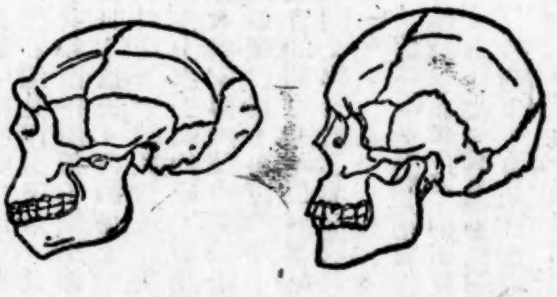
與現代人和類人猿有什麼不同呢？要可分爲十點說明之：

1、中國猿人，頭骨前額特別低平，沒有現代人那樣高起，但比類人猿發達。

2、中國猿人頭骨眼孔之上有一個特別發達的眉骨嵴，這是原始性質之一，現代人中是沒有的。

3、中國猿人的頭蓋骨很低，但比類人猿略高。頭骨最寬的地方在兩耳際，現代人則在耳際的上部。（參看插圖二）

插圖一、（根據賈著「中國猿人」插圖）



插圖二、左爲中國猿人頭骨右爲現代人頭骨

4、中國猿人頭頂正中前後有一條隆起的嵴，叫做「中矢嵴」。

5、中國猿人的頭骨較厚，腦量較小，猿人腦量平均爲一〇七五公分，現代人腦量平均一三五〇公分。人類愈進化頭骨愈薄，腦量愈大。

6、中國猿人顏面骨眼窩很深，兩眼距離較大，鼻樑平寬，鼻孔低深，顴骨外張，上顎前伸。

7、中國猿人的下顎骨與現代人不同的最大特點，是齒緣前伸，而沒有下頦，尙具有類人猿的性質。

8、中國猿人牙齒構造大致與現代人相似，只是牙根特別長，形狀粗壯，不整齊。臼齒咀嚼面的構造雖比類人猿者較爲簡單，但比現代人則複雜的多。

9、中國猿人的四肢骨發現甚少，大腿骨比現在人的短而寬，骨幹彎度不大，彎曲的位置在骨幹下部。這種特徵雖與現代人不完全相同，但據研究，與現代人已很相近，證明猿人已能直立。

10、中國猿人上臂骨也與現代人相近，與類人猿的上臂骨區別較大，証明猿人已能和現代人一樣的利用上臂骨工作。

這僅是就形體方面來說的。此外中國猿人還有一個主要特徵就是能够製造和使用簡單工具，已經知道使用火，更說明中國猿人已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本質的不同。但中國猿人是否就是現代人類直接的祖先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國猿人是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因爲中國猿人很多特徵在現代不同的人種中都可以找到痕跡。尤其是中國猿人上門齒是鏟式的，而這種鏟式的特性正是蒙古人種所特有。不但這樣，而且據現在的研究，中國猿人與尼安德特人的關係已經證明更爲密切，比如尼安德特人頭骨的最寬點比中國猿人靠上，現代人的比尼安德特人的又靠上。很多特徵都証明尼安德特人是居中國猿人與現代人之間的地位的。這就說明了人類發展的過程，是從中國猿人演變到尼安德特人，然後再由尼安德特人演變到現代的人類。中國猿人是人類直接的老祖先。中國猿人化石的發現對社會發展史人類進化史的貢獻是很大的。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五六十萬年以前，人類的老祖先中國猿人就生活在我國疆域中河北省的境內了。但是，在那時候周口店的環境是怎樣的呢？我們先從與中國猿人伴生的動物羣說起，根據研究與中國猿人伴生的動物已知的就有一百一十五種。其中有兇猛的後來絕跡的劍齒虎，梅氏犀牛等，也有易於獵取的葛氏斑鹿，腫骨鹿以及馬牛羊等。就化石的總體來看，當時周口店應該比現在溫暖濕潤，其情形近似我國的南部。當時這羣中國猿人居住的洞口可能向東，因爲龍骨山猿人洞東面有一條小河，東面和南面又都是平原草地，這樣他們可以容易得到飲料，更容易獵取草原上的牛馬羊鹿，在洞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山地森林地帶，猛獸出沒其間，對中國猿人時常是侵害的。但因爲中國猿人結羣集體的出獵，也常能戰勝這些野獸。

在含中國猿人化石的堆積裏，都可以發現石器，有的還發現有骨器，有的地方更有燃燒過的痕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猿人已經會製造和使用石器骨器並且還會用火。其情況是這樣。

猿人的文化遺存

（1）石器：中國猿人製造石器採用的石材，可以分爲四種，就是綠色砂岩、石英石、水晶及燧石。其中以石英石最多。石器之中很少有樣子相同的，也就是當時工具的用途並不清楚。這是因爲中國猿人製做石器的方法還很原始所致。當時製做石器的方法雖然原始，但還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出打製石器時工作的痕跡。比如中國猿人製造一件石片石器，他們必先選好一塊長圓形石材，次將頂端部分打去，使成爲一個平面，再由平面邊緣打擊，即可打下相當規律的石片來。以後再用石片做成眞正的石器。打擊石片做成的石器，有很多種，如斧狀器、尖狀器、刮削器、及平圓狀器。大型的如斧狀器長可達十多公分，小型的如尖狀器長只有二三公分。

（2）骨器：從前發現堆積中的碎骨都以爲是猿人取食骨髓而砸碎的。從一九三一年以後，才注意猿人製造骨器的問題。專家研究結果，其中有七十多骨塊片，確實帶着人工製造的痕跡。曾有人反對猿人能製造和使用骨器，他們把歐洲舊石器時代不會用骨器的特點，生硬的搬到中國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可機械的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認爲猿人旣可以製造石器，打來野獸，便可能用獸骨做器具。含有中國猿人化石的堆積中所發現的骨製工具，有角工具，頭蓋骨容器，肢骨製的尖狀器刀形器以及刮削器等。

（3）用火痕跡：中國猿人會使用火的証據是周口店骨化石地層中常含有黑色沙土，經研究後知道是燃燒過的灰燼，骨化石也常有黑、白、棕、紅、淺黃、綠、藍、灰等不同的顏色，經研究知道這些有顏色的骨化石是因火燒過的程度不同變成的。另外還有燒過的紅土遺跡。這可以證明中國猿人已會用火熟食。用火熟食，食物範圍擴大了，消化過程縮短了，這是對人類的形體和腦量的發展有很大作用的。

猿人化石被日美帝國主義的劫奪

就因爲中國猿人化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資料之一，帝國主義者早就想竊奪這種東西。自一九二九年起，因爲反動的國民黨政府不重視中國人民的文化事業，對「北京人」的發掘工作不與支持反而接受了美帝國主義的「投資」，使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經費由羅氏基金董事會捐助，並定有合同，其中規定該董事會推薦一人担任中國猿人之研究，所得標本歸地質調查所所有，永遠存於中國，不許運往國外。但在一九四一年日美關係惡化之後，被派研究中國猿人化石的魏敦瑞卽準備把猿人運往美國。是年十一月初，曾將化石裝了兩大木箱（其中包括中國猿人化石，山頂洞人化石，及雲南、廣西發現的褐猿化石），十一月底運到美國大使館。在未及起運時，日美戰爭就爆發了。從此猿人化石宣告失踪。日帝曾在京津大肆搜尋。在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間，曾一度傳說，已在天津找到。後來一直就沒有消息。直到抗戰勝利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天津大公報曾刊載了一個消息，說是前爲日軍竊奪並運到東京之「北京人」骨骼現已發現。這個消息是所謂「盟軍」最高總部發表，由中央社和路透社同時報導的。但後來國民黨反動政府又宣稱「盟總」接收者並非中國猿人的眞化石，而是石膏模型。我國的國寶中國猿人化石還是沒有下落。就在今年元月人民日報刊載一段報導，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柯耐博士給楊鍾健先生來信，來信証明「北京人」標本確係美國强盜從日本搶去。柯耐博士信中說：華特生——倫敦大學生物係主任告訴他，「周口店Ⅱ」的頭骨現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裏，那是魏敦瑞死前送去的，華特生上次去紐約時，看見那個標本在魏敦瑞手裏。這個標本是一個美國兵由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搶掠去的。這個消息的發表再度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的無恥的盜竊行爲，再度撕毀了侵略者的虛僞面具。我們中國人民對這樣掠奪我國國寶的罪行是不能容忍的（至日帝如何殘酷的破壞我國文化遺存，其詳況可參閱文物資料二卷三期賈蘭坡著「中國猿人化石的失踪及新生代研究室的損失」）。

【註二】中國猿人化石是指中國猿人的骨化石而言，骨化石是指獸類或人類骨骼掩埋在泥沙裏，經過許許多多年代的變化，骨骼裏所含的有機物質爲礦物所代替，完全變爲石質的意思。中國舊名稱爲龍骨。

丙、河套人及其文化

「河套人」是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一種人類，他和尼安德特人同樣代表人類發展史的第二個階段。因爲他的遺骸和文化首先發現在我們河套地方

，所以叫作「河套人」。河套人化石發現在薩拉烏蘇河小橋畔。這個遺址東距寧夏省橫城一百五十公里。原來歐洲更新統地層（黃土）中早就發現了很多人類的化石，如一八四八年在德國發現科爾庇人，一八五六年又在德國杜塞索多夫發現尼安德特人等等。據此推測在中國同一地層也可以發現人

河套人化石的發現及發掘經過

類化石。因而法國巴黎博物院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兩次派遣德日進桑志華到我國河套考察。在一九二三年行至橫城東面二十五公里水洞溝地方，在黃土峭壁上發現了灰燼碎骨和人工打碎的石塊，後來又東行到距橫城一百五十公里薩拉烏蘇河岸，他們首先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動物化石——犀牛頭骨。他們在這裏發掘又發現了石器，並且還發現了一個古代人類未成年人的一個左上門齒。此外，在這兒的地面上拾了三件古代人類的膀骨。這個遺址是蒙人王斯究克首先發現的，所以他應該居河套遺址發現的頭功。這個遺址的地名是個小村莊名子，叫「小橋畔」。此後不久他們在一個小村油房頭地方發現了另一個遺址。

河套人化石的特點及其環境

河套人化石發現的太少，只有一個未成年人的左上門齒，其他三件肢骨因是地面拾來的，一向都未被人注意（現存北京地質調查所）。所以我們專就這一點化石來講是不够的，必須引用尼安德特人的材料。尼安德特人的像貌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參看插圖三，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尼安德特人仍保留一部份原始性質，如有發達的眉骨嵴、吻部向前突出，沒有下類。但他又比中國猿人進化了很多，頭頂已經漸漸高起，不像中國猿人那樣低平了。由於遺留下的骨骼可以推知這種人軀幹相當粗壯，頸短臂長腿短，眼上長着眉骨，鼻子寬平，上唇很長，從外表來看，是很醜的。再專就河套人的門齒來講，它是一種鏟式的，這種鏟式的性質，在現代蒙古人種中仍然保存。尤其是從牙齒舌突來看，現代華北人的舌突，雖不如河套人那樣發達，但有的仍然保存着，證明河套人與現代人有直接的關係，應是人類發展第二階段我們的祖先。至於那三件肢骨現在亦經賈蘭坡先生研究，初步認爲是和門齒同一地層的產物，其中的大腿骨彎曲位置與尼人者相同，上臂骨與現代華北人相當。

尼人頭骨

尼人復原塑像面貌

插圖三（根據賈著「河套人」插圖）

這樣我們也可以知道人類發展第二階段的祖先也曾生活在我國境域之中了。但是那時候薩拉烏蘇河附近的環境是怎樣的呢？我們先從與河套人伴生着的動物羣說起，在河套一帶兩個遺址中所發現的動物化石，已知者共有四十六種。其中已經絕滅的有巨齒象、披毛犀等，已不見於河套的有騫驢、赤鹿等，仍生存在河套的有羚羊、狼等。就這些動物來分析其年代相當於更新統的中期。根據地質上的研究薩拉烏蘇河附近河套人產地當時有湖沼、森林、和草原，就食草原上的動物羚羊和鹿應是河套人的主食。對巨大的動物如犀牛、巨齒象、駱駝等，他們也可能用陷阱或圍獵的辦法來捕捉，這不是經常的。

河套人的文化遺存

河套人文化遺址最重要者有兩處，一爲水洞溝遺址，一爲薩拉烏蘇河遺址。水洞溝遺址分佈在黃土層裏，曾發現有大量的石器。石器的原料，有紅色石英石、雲母砂岩及沙質石灰岩三種。石器的種類約可分爲四種，即尖狀器刮削器彫刻器和斧狀器。尖狀器做的很精巧，爲河套人文化的標準石器。薩拉烏蘇河遺址發現在硬層中，由發現的古生物證明這個地層是與黃土同時生成的。薩拉烏蘇河遺址發現的石器非常細小，原因是缺乏原料。原料大部分是石英岩，只有極少部分是用火石製成的。石器的種類主要有三種，即尖器刮削器和彫刻器。除石尖器之外，在這兩個遺址中還發現有骨器，骨器在薩拉烏蘇河遺址中最多。尤其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河套人已知自己造火。猿人時代只知用火管理火，到河套人時代才會造火。造火是當時人類的偉大發明，使人類生活又向前邁進一步，後來文明都是建立在這個發明基礎之上的。

丁、山頂洞人及其文化

山頂洞人的發現及發掘經過

山頂洞人化石也發現在周口店龍骨山。發現地點是在猿人洞的最上部的山頂洞裏。山頂洞是在一九三〇年發掘中國猿人化石時裴文中發現的，當時並未即刻發掘，到一九三三年才正式開掘。山頂洞是在中國第一次發現的更新統晚期的山洞，在此共採獲標本二二五箱。從山頂洞發現的人類化石，有完整的頭骨、頸骨殘片、上顎骨、下顎骨及軀幹骨等。從全部材料中至少可以認出七個男女老幼不同的個體。山頂洞人已和現代人非常近似了（參

山頂洞人化石頭骨

插圖四（根據賈著「山頂洞人」插圖。）

看插圖四）。就山頂洞人的頭骨來說，顴骨高出，腦量發達，頭蓋厚薄與現代人相似，下顎骨亦無原始性質，在山頂洞裏所採掘的動物化石也很多，其中種類以虎鹿狼兎等最常見，豬牛驢鼠狗次之，鼠狗這種動物是舊石器時代特徵之一，因它到新石器時就絕跡了。再根據地層等研究，可以斷定山頂洞人的年代在距今約十萬年左右。

山頂洞人的文化遺存

山頂洞人的文化遺存，先從石器來說已比河套人的石器精緻，但在山頂洞遺址中發現的石器並不多，一共有二十五件，另外還有一些礫石和石英碎塊，並未有人工痕跡，只是當時人類採來的石器原料。山頂洞石器原料有石英、礫石，火石和燧石，以石英爲最多。共種類有凹刃刮削器，斧狀器、尖狀器、刃器等。山頂洞內發現的眞正骨器也很少，但重要的是發現了一件骨針，骨針長八十六公厘，眼部殘破，這是磨製而成的較精緻的骨器。這一方面說明當時人類已知道縫綴，另方面說明當時石器製造已走向磨製的途徑。骨針之外還有磨光的物品，如磨光的鹿角和鹿下顎。山頂洞人已知道佩帶裝飾品，如石珠（發現了七枚，概是白色石灰岩製成者），如帶孔的小礫石，穿孔的牙齒，骨墜（骨製空管），帶孔的貝殼，及魚的脊椎有空的魚骨。這些裝飾品出現更說明生產力已經提高了一大步。若以海蚶化石和葬人處的赤鐵礦的碎粒和石塊來說，則更可證明山頂洞人當時人與沿海居民和產赤鐵地方的人有了連繫。山頂洞人的生活，可能是以獵獸爲主，已經有了埋葬死人的習慣，說明當時社會已走向氏族社會的途徑。

在中國猿人河套人和山頂洞人化石發現、整理之前，有的學者像莫爾干就說中國文化史前時代完全不知，更有的學者像洛佛爾則說中國根本沒有石器時代的人類。現在我們發現和整理了這些材料，這種說法已完全成爲過去了。從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我國疆土上舊石器時代初期中期末期都是有材料的，而且人類發展三個階段在中國都是有遺跡的。在這五六十萬年的悠久的時代裏，我們的人類祖先就在我們疆域裏不斷的勞動不斷的改進工具，不斷的改造他面對着的世界，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從原始人漸漸的發展到氏族社會。

二、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甲、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點

經過幾十萬年的勞動鍛鍊，人類的祖先把石器改進了。這種改進的石器叫作新石器。新石器是對舊石器而言的。人類使用石器生產的時期很長，一共幾十萬年。在這幾十萬年視人類製造石製生產工具的方法大體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即（1）只會打製的階段，也就是舊石器時期；（2）已知磨製的階段也就是新石器時期。新石器時期約在一萬年以前開始。新石器時代的特點是（1）石器製造把石塊打成工具形狀後再加以磨製已很精細；（2）有的石器可以按上木柄或者鑽孔穿繩；（3）已經有了陶器。人類在可能有較長時間的定居生活時才會製造和使用陶器，所以陶器更是人類定居生活的標誌。

新石器時代文化，在我國分佈是很廣的。西自新疆，東到東北吉林、山東、台灣；東自內蒙北部，南到廣東的沿海，都已經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這也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悠久。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分爲三個系統，即細石器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現在再分別加以介紹。

我國新石器文化的時代

新石器時代相當於氏族社會時期。而氏族社會時期又可分爲以漁獵爲基礎的氏族社會階段（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和以農耕爲基礎的氏族社會階段（新石器的中期至末期）。在我國文化遺存中，前者以我國細石器文化之昂昂溪文化遺址爲代表，後者以仰韶文化及龍山文化爲代表。

乙、中國細石器文化

我國細石器文化的發掘

細石器文化分佈甚廣，遠及歐亞非三洲。因我國境內者有其特質，故名「中國細石文化」。我國細石文化重要遺址有顧鄉屯遺址（地質是更新統，石器似細石器，古生物與時代不相吻合），昂昂溪遺址（新石器時代初期文化），林西遺址（新石器時代中期或晚期文化，已漸次變爲農業生活）。此外還有錦西沙鍋屯遺址，貔子窩遺址，和熱河赤峯遺址。至內蒙、河套、新疆之細石器文化雖曾採大量標本，但均未研究完畢，至今無所發表。

因為細石器文化遺存主要多在長城以北，尤其是在東北。而東北在四十來年前即早為日帝所垂涎。那時候他們不但進行政治經濟的侵略陰謀，而且也已經開始了對文化的控制和掠奪。東北細石器文化首先就是日本人鳥居龍藏發掘的。他在一九一五年曾發表了「東北南半部史前文化」一文。其後日人至東北「考古」者漸多，一九三四年水野清一曾著有滿蒙新石器時代要論」一書，到一九二一年安特生曾在錦西沙鍋屯發掘，一九二七日人又發掘了遼東半島的高麗寨和單陀子兩遺址（碧流河畔），著有「貔子窩」一書，一九三〇年我國考古學者梁思永曾發掘過黑龍江昂昂溪文化遺址，著有「昂昂溪史前遺址」一文，同年並在林西文化遺址和赤峯文化遺址等處採集細石器，著有「熱河林西雙井赤峯所採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和陶片」。一九三五年日人濱田耕作又在日帝侵略武力掩護下往赤峰附近發掘。由此可見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與其政治經濟的侵略是分不開的。但細石器文化裏面昂昂溪文化却是有其主要代表性，這個遺址是我國學者發掘的。

根據裴文中氏意見，細石器文化是由西伯利亞傳播而來的，至呼倫泊附近為中石器時期，至昂昂溪為新石器時代初期，至林西已進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或晚期，以後再向南傳播到長城附近即受到彩陶文化的阻止，便再向西推移，因此長城附近的細石器文化已經是與彩陶文化混合的文化了。

主要文化遺存

以昂昂溪文化遺址來分析，細石器文化遺存，主要為細石器。細石器的特徵是細小精緻，多係燧石製成，鋒刃亦銳利。就形狀來說，有石核刀、石核鑽、細錐尖石器、石箭頭、刮削器、凹刮器等。次為骨器，骨器多係出自墓葬者，有槍頭和魚鏢槍頭有大小二種，大的有倒鈎可獵海獸，小的也有刻成的鳥嘴形倒鈎，魚鏢和小槍頭製法完全一樣。再次為陶器，出土只兩件，一為帶流的深碗器皿，一為圓形的罐，可見陶器使用並不普遍。當時人還沒有比較長時間的定住生活。在細石器文化遺址中亦發現有埋葬的習慣，他們是把死者放在地上，不挖洞穴，安排殉葬物，即用土掩蓋。殉葬物多係生前所用的，與仰韶殉葬物不同。（參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遺址」一文）

對昂昂溪細石器文化之認識

在分析昂昂溪文化遺存之後，我們即可推測當時的經濟生活。因為這裏的遺址不够廣大深厚，陶器數量非常少，形狀簡單，製法原始，都證明尚還沒有鞏固的定居生活。但有這兩件陶器也就是說當時已經定向走居生活了。石器中沒有更大的石器，沒有石斧，足以證明農業還未發達。骨器中有很多骨鎗魚鏢存在，都是漁獵工具，可知當時人主要是經營着漁獵生活。當時的社會正是以漁獵為基礎的氏族社會時期。

丙、龍山文化——黑陶文化

龍山文化依照年代應放在仰韶文化以後去談，但談仰韶文化許多地方都要涉及龍山文化，所以我們先談龍山文化。

主要遺址的發掘

龍山文化主要遺址首先就是山東濟南龍山鎮城子崖，和山東日照縣兩城鎮。城子崖的發掘，時間在一九三〇——三一年，指揮這一工作的是李濟、董作賓、吳金鼎等人。作有「城子崖（山東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存）」一書。在城子崖古代人類遺址處曾發掘出來兩種文化層，上者為周代遺物，下者有黑色陶片、骨角器、石器等遺物。一般考古學者已認定係中國史前時期文化，其時人類尚不知使用銅器，定名為龍山文化。又因陶器多黑色，表裏光滑，陶質甚細，陶胎甚薄，也叫做「黑陶文化」。兩城鎮文化遺址是在一九三六年由梁思永、劉燿、祁延霈發掘的。兩城鎮遺物也很豐富，材料運南京後，七七事變，日寇侵入我國，發現的人骨被日帝盜竊。其他主要地區為安陽的後岡，在一九三一年梁思永也曾發掘，發現有上下三段文化層，上為小屯文化

插圖五　不召寨的黑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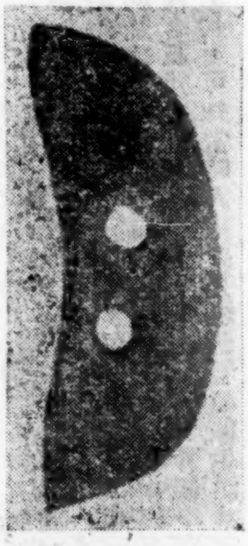
，中為龍山文化，下為仰韶文化。著有「後岡發掘小記」「小屯龍山與仰韶」兩文，從此可知龍山文化比仰韶文化為晚，比小屯文化為早。再如濬縣新村、不召寨（參看插圖五）、澠池等等地區也都有龍山文化的發現，但龍山文化發掘報告發表的也不多。根據已發表材料，推知龍山文化可能由東而西發展的。黑陶文化遺址，大體都在小河道的沿岸，情形和仰韶文化相似。遺址比較廣擴，文化層很深厚。如兩城鎮文化層南北二百公尺，東西四百公尺；龍山鎮城子崖文化層南北有五百公尺，東西在三百公尺。就文化遺存的豐富，和有殘存的板築圍墻而言，證明了人類在這時期定居在一定地方，已可能有很長的時間了。

關於龍山文化遺存的情況，我們可以先從工具談起。龍山文化石器種類很多，有石槍頭、石鑿、石斧、石錛、鏟形石刀、雙孔半月式石刀。（參看

插圖六）這些石器最大的特色就是磨製的精細。並且我們

文化遺存

從上述幾種石器中更可以證明當時農業已相當發達。骨器裏面有骨針，骨針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一端帶孔的，一種是兩端都尖的。有骨梭，可見當時原始的紡織和縫紉手工業都已開始。還有骨製的魚鏢。蚌製工具在龍山文化遺物中是常見的，除了天然的飲水、掘土的蚌工具之外，並且能用蚌殼製成蚌刀、蚌鏟、蚌箭頭等。此外還有陶器。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主要的區別，就在陶器的製做、形狀、紋飾、色澤的不同，因為龍山文化陶器是以黑色為主的，所以也叫黑陶文化。



插圖六

插圖七

龍山文化的黑陶，並不是泛泛指黑色陶器而言，因為龍山文化的黑陶還有他的特點。龍山文化標準黑陶的持點就是色澤黑而光亮，表裏一致，土質細膩，陶胎很薄，表裏無裝飾物，所以龍山文化的標準陶器是很精緻的。他的形狀可分鬲形器、鼎形器(參看插圖七)、鬹(參看插圖八)、鬼臉式鼎器、甗形器、豆形器、無耳鑵子、平底盆、圓足盤等（參看插圖九）。以鬲形器最重要，因為從龍山的陶鬲與小屯的銅鬲比較中都可以證明小屯文化是承繼龍山文化而來的。黑陶的花紋是在泥土未乾時劃成者，指印方格繩印等等花紋也屬常見。但其特點就是沒有彩色的花紋。

此外，我們更可以從龍山文化遺址中看出當時的人已有埋葬的習慣，屍體一般來說多是向東仰身，但亦有俯身者。西城鎮葬地，殉葬物很豐富，有玉質扁平帶孔的石斧

插圖八

。當時葬地遺址沒有棺槨的痕跡。龍山文化時代宗教信仰的發展已知道卜巫，卜巫的東西就是卜骨，這種東西是對與殷商用甲骨卜巫有影響的。

從龍山文化遺址發現的動物骨骼中有猪狗羊牛馬的獸骨，尤以猪狗為多，這種動物也是後代黃河流域的人常養的東西，由此更證明當時畜牧業已相當發達了。

對龍山文化的認識

從龍山遺址發現的工具來看，說明龍山文化時代農業已相當發達，所以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一樣，都已是農業為主的氏族社會階段——也就是氏族社會末期的文化。從河南安陽後岡的發掘中更可以證明龍山文化晚於仰韶文化，而早於殷商小屯文化。（1）龍山文化有陶鬲，小屯文化有銅鬲，（2）龍山文化有卜骨，小屯文化有卜巫用的龜甲獸骨，（3）龍山文化有板築，小屯文化板築已發達，（4）龍山文化時代人類已有埋葬習慣——仰身東向，用陶器等殉葬。小屯文化中關於屍體埋葬亦有同樣性質的情況，由以上諸點來觀察，均可證明龍山文化可能是殷商小屯文化主要來源之一，但小屯文化把它發揚光大了。所以龍山文化在我國史前時期是占着頭等重要地位的。

插圖九 鬼臉式鼎器形狀

丁、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與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分佈頗廣，約佔中央亞細亞大部，歐州東部及中國印度等地。因地域不同，此種文化的性質和它所代表的年代，也因之不同。中國發現彩陶文化，始於一九二一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古人類遺址，定名仰韶文化。見氏所著「中華遠古之文化」。次年，安氏又在甘肅等地發現遺址甚多，見氏所著「甘肅考古記」。一般人容易將「彩陶文化」和「仰韶文化」名詞混淆，應注意兩點：

1、過去認為澠池仰韶遺址，是仰韶文化標準地點，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此時期人類，雖以彩陶為其特產物，但不能即以彩陶文化為完全代表，何況近來考古學家證明仰韶文化，彩陶和黑陶混合在一起。無層次可分，仰韶文化，實際是仰韶和龍山的混合文化。不過學者仍以「仰韶文化」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彩陶文化。

2、彩陶被人類使用的時間，約自仰韶時期起，至我國有史時期如殷商周漢，凡有彩陶遺物的文化，都可謂彩陶文化，所代表的時間，可以是仰韶時期，也可以是商周及漢代，由此可見彩陶文化一辭，當極力避免。

安特生對河南甘肅彩陶的分期

安特生氏研究河南之仰韶文化和甘肅的彩陶遺物，約略估計其絕對年代，分爲六期：

齊家期　紀元前二五〇〇——二二〇〇（寧定期）

仰韶期　紀元前二二〇〇——一七〇〇（澠池縣，寧定縣半山。）

馬廠期　紀元前一七〇〇——一三〇〇（碾伯縣）

以上爲新石器時代晚期

辛店期　紀元前一三〇〇——一〇〇〇（洮沙縣）

寺窪期　紀元前一〇〇〇——七〇〇（臨洮縣）

沙井期　紀元前七〇〇——五〇〇（鎮番縣）

以上爲銅器時代

安氏據以分期的這幾個遺址，除仰韶村曾經過相當發掘外，其他的遺址不過地面調查一下而已。就是仰韶的發掘，也不過遺址的千分之一，材料不鞏固，結論自然不可靠。最近我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同志到澠池縣調查，主要觀察仰韶村地層情形，發現彩陶和黑陶是混在一起無層次可分，證明仰韶村遺址的文化，不是彩陶文化盛期，而是「仰韶」和龍山的混合文化。他們又到離仰韶不遠的不召寨調查了一次，那裏和仰韶村並不相同，根本沒有彩陶存在。由此證明不召寨是屬於龍山文化，而安特生把它歸在仰韶文化裏，也是絕對錯誤的。安特生在最初發掘仰韶村的時候，所得到的彩陶數量並不多，不過他專撿出了彩陶和特別的器物來發表，使人發生錯誤的感覺，認爲仰韶文化是以彩陶爲主體的。這是帝國主義學者的欺騙行爲。（參閱歷史教學三卷一期安志敏豫西考古紀略）一九三一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陽後岡發見新石器遺址的重疊層，上層白陶，中層黑陶，下層彩陶，（參閱安陽發掘報告：後岡發掘小記）這可證明新石器時代河南北部曾有兩種不同的文化遺存。「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它們在時間先後上，也有着相當的差別。

上面已說過，不召寨遺址，沒有彩陶，實爲龍山文化遺存，安特生在此得陶器六件，視之爲和仰韶是一種文化，實爲錯誤之基點，安氏並假定它早於仰韶遺址文化，名之爲單色陶器。並得到單色陶器早於彩色陶器的基本觀念。安氏以此爲出發點，分析甘肅境內所獲的大批材料。他見寧定縣齊家坪「單色陶器」多，彩色陶器少，就推測它早於仰韶文化遺存，實則早的可能性很少，根本不是一個文化系統。裴文中氏曾到齊家期遺址調查，陶器多爲單色陶器，彩陶甚少，且紋飾甚簡單，認爲所謂齊家期者，實代表彩陶以外之另一種文化。夏鼐也曾發掘齊家坪墓葬，在考古學報發表「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一文。

齊家期、寺窪期，實與彩陶文化系統不同。安氏認爲同一系統，劃分六期，是錯誤的。就是齊家文化和寺窪文化，兩者也系統不同。除不加彩繪相同外，其餘陶色文飾、作法、器形、陶質均不相同，仍待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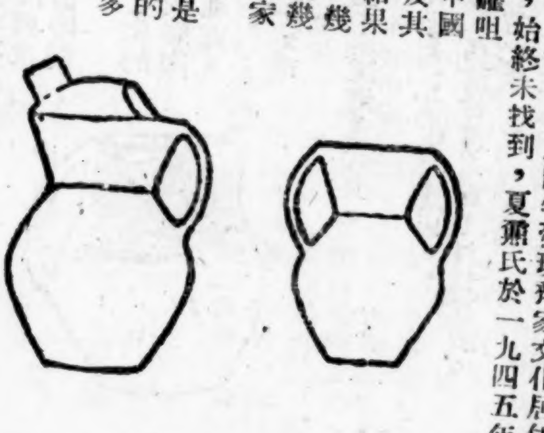
所謂彩陶六期的特徵

安氏六分期既不能成立，姑仍按六期，介紹陶器特徵，亦可見文化系統不同：

齊家期：安特生氏於一九二四年發現齊家文化居住遺址。但這文化的墓葬，始終未找到，夏鼐氏於一九四五年方於寧定縣半山區的瓦罐咀發現齊家文化期的墓地，夏鼐氏在中國考古學報發表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一文。可以參考。發掘結果，證明齊家坪遺址齊家期文化層中，幾乎可以說完全沒有彩陶片。偶或出土幾片仰韶式的彩陶片，可以斷定不是齊家文化人製造的。

它們混入齊家期的遺物中，若不是較古的仰韶文化遺物，便是鄰近殘存的仰韶文化區的輸入品。齊家期陶器，多

（插圖十一）仰韶花紋精細的彩罐



插圖十

單色，有粗細兩種，粗陶多爲灰色繩紋之高罐（插圖十），或下部籃紋的大罐，細陶有雙大耳小罐及篦紋陶。篦紋陶爲長城以北細石器文化產物，故齊家坪遺址可能爲彩陶與細石器文化的混合文化，齊家期遺址中亦有細石器遺物。

仰韶期：甘肅「仰韶」期彩陶，住地

以臨洮馬家窯等地最重要，葬地以寧定八羊溝附近之半山為最重要。殉葬的彩罐花紋最精細。(參看插圖十一)

馬廠期：遺址分佈於青海東部，甘肅河西走廊，大夏河流域等地。居地以西寧十里舖為代表。葬地以碾伯縣馬廠沿為代表。其地適在大通河入湟水花紋較簡。亦有體高頭短，花紋較精的殉葬彩罐。西寧朱家寨殉葬物中有彩罐(參看插圖十二)很精美。與洮河流域之半山區遺物相似。

插圖十二

辛店期：辛店期的葬地，除洮沙之辛店外，尚有臨洮王家坪，寧定齊家坪等地。住地則以洮沙的灰嘴等地為最重要。辛店期之處。的彩陶質粗，為退化象徵。色紅，表面多敷以紅色陶衣，再繪以甚寬之黑色或深紅色條紋，條紋多彎曲及直線組成之。回紋、寬線中間，常有繪成的太陽形及曲折紋等。器形多甚大，雙耳、大口、小底並有鬲形器。(參看插圖十三)

插圖十三 辛店期陶器形狀

寺窪期：寺窪山在臨洮之南，距城約四十里，在洮河西岸。此遺址住地皆為仰韶期者，至於寺窪期者，則為葬地。殉葬陶器色深紅，或磚紅，寸底、雙耳、口扁圓，兩邊高出，即所謂「馬鞍式」。(參看插圖十四)除此種陶罐外，尚有陶鬲陶鼎等物，無有彩陶。至陶鬲陶鼎等，似受中原文化影響之產物。一九四五年，夏鼐發掘寺窪期墓葬，得銅鑄一件。寺窪期文化，當甚晚。系統今尚難詳。

插圖十四 寺窪期馬鞍式陶器形狀

沙井期：沙井期的彩陶文化遺址，發現於鎮番之沙井(縣城西三十里)及附近的留胡屯。前者為葬地，後者為住地。陶器質稍粗，多為磚紅色。器形有單耳或雙耳的筒狀杯，(參看插圖十五)或兩耳圓底大口罐，及麤大的三足鬲等。陶器表面多加陶衣，彩繪多為寬窄的條紋所組成，有「鳥形」記號(參看插圖十六)。沙井期銅器，有銅刀，銅箭簇。這期遺物，時代當甚晚。(以上參閱西北通訊二卷八期及九期。裴文中史前時期之西北。)

插圖十五

插圖十六

彩陶文化分佈區域

黃河流域為彩陶文化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又可分為中原地區，及黃河上流二部分。

(一)中原地區：又可分為三方面。

豫西：以澠池仰韶及廣武秦王寨陳溝為代表。

豫北：洹水沿岸：安陽後岡。

洪水沿岸：濬縣大賚店。

晉南：山西汾河流域。以夏縣西陰村萬泉縣荊村為代表。

(二)黃河上流：在甘肅青海二省境內，又可分為三區：

洮河流域：指寧定、臨洮及洮沙三縣內的遺址而言。主要包括齊家、半山、寺窪、及辛店四期遺址，這四個遺址，又代表不同的文化系統，今尚難詳悉。

西寧附近：以馬廠沿朱家寨等地最重要，此期彩陶，製作較半山期陶器稍晚。

鎮番附近：以沙井遺址為代表，為彩陶文化末期。

黃河流域以外，尚有邊陲地區的彩陶文化，如長城附近，西北、東北等地係彩陶文化由黃河流域，漸向邊陲分佈，多與他種文化混合，繼續存在，至我國歷史時期，始行絕滅。茲不多述。至於黃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已於史前時代被他種文化起而代之了。(參閱裴文中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一書，新石器時代章中，中國之彩陶文化一節。)

文化遺存

仰韶文化遺址，大都分佈在肥沃的河谷間，便於牧畜業和農業，仰韶村的遺址南北九六〇公尺，東西四八〇公尺，西陰村遺址東西五六〇公尺，南北八〇〇公尺，與現今的小村落相當，村落遺址的廣闊，文化層的深厚，都表示居住的悠久，設非務農，則難以自存，而且陶器上有繩紋，可知當時有紡織和植物的培養。遺址中豕、羊、牛、馬、鹿骨很多，尤以豕骨最多，也是農業社會的現象。陶器之多，製作之精，表示出當時的定住生活，可以看出農業已經是當時人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畜牧業也同樣進行着。總之，仰韶文化代表的社會，是以農業爲基礎的氏族社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過渡到銅器時代的社會。

澠池縣仰韶村文化層，是一種彩陶黑陶混合文化，不能做代表的說明，今以夏縣西陰村爲例：遺址有石斧、木製房屋、小舟家俱，採伐、農業都用石斧。有半月形石刀，中間穿一孔至兩孔，這是摘取穀類的穗子用的。有骨製箭頭、骨針錐，有紡輪，可見已有紡織。西陰村的特殊發現，有半個蠶繭，可見我國養蠶發明之早。

由石骨器的反映，也可見是一種以農業爲基礎的氏族社會，仰韶文化時代的人們已有埋葬習慣。據安特生甘肅考古記，頭多北向，大多仰臥，亦有俯身或側臥者。無任何石質裝置及棺槨痕跡。殉葬物有石、骨、陶器，時有死者身上塗朱者。墓地中獲玉片及貝，可知交換已有萌芽。

對仰韶文化的認識

從上述各點，我們已可斷定仰韶文化人是人類學上眞正的人類，從遺址範圍及石斧使用來看，知當時經濟生活，以農業爲基本。牧畜也相當發達，豬的飼養已爲常事，同時更已經開始了紡織，交換已經萌芽。因其遺址廣闊，文化層深厚，陶器很多，可證明當時已進入定住生活。並且陶器製作技術進步，花紋已有藝術風味。至埋葬方法這時也已固定，對死者依然生於另一世界的迷信觀念已發生了。

戊、反對「中國文化西來」的謬論：

關於中國歷史古代史部分史前時期文化遺存，我們已談了一個梗概。從此我們可以知道，舊新石器時期遺跡，在我國疆域內是都有的。從此我們可以打破了帝國主義「學者」蔑視我國悠久文化的「中國文化西來」的謬論。安特生研究彩陶文化時，又曾把這種謬論搬出，他的理由是（1）彩陶花紋有時和西歐陶器花紋相似；（2）安氏以鬲爲中國文化之特徵，以不召寨之單色鬲認爲是彩陶文化之物，並說彩陶的鬲是承自西方的。企圖證明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是從西方移殖過來的。豈不知中國彩陶文化愈往西發掘代表的時間愈晚應爲中國土生土長的文化；並且發現陶鬲的不召寨係黑陶文化，與彩陶文化無關。他這種企圖更已爲鐵的事實所粉碎了。當然我們承認中國文化不是孤立的，在某一時期某一地區常要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而且中華民族更是善於接受外來的好影響的。但是我們有鐵的事實可以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學者」否認中華民族文化有獨立性的謬論。

第十九期要目

歷史教學月刊社聲明
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面貌……魏宏運
學習「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來新夏
「壬辰倭亂」和中朝人民的抗戰……柳樹人
中國水車歷史底發展……程溯洛
晚明官僚一筆貪污帳……李文治
辛亥革命……段昌同

第二十期要目

遵循着毛澤東思想前進……吳廷璆
中國革命武裝的重要意義……禹一寧
美國共產黨和一九二四年的拉·福萊特運動……美國福斯特著 辜燮高譯
史可法討論三篇……單冠英、朱沾、魏宏運
參觀旅大市中學歷史教學工作後的幾點收穫……李光璧
部隊中歷史教學的經驗……光翔、長征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來新夏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續）

——中國近代史講課記錄——

來新夏

二、「帝制」與「反帝制」

列強導演下的醜劇——「洪憲帝制」

袁世凱的代替滿淸，在帝國主義只是換了一架新的統治工具，而這架工具正是帝國主義早巳「賞識」的「强人」，英使朱爾典在辛亥革命時就認爲袁世凱的名字「對軍隊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日人也認爲袁世凱之於中國「確有絕對之勢力」（十七）。美國更是「堅持認定」袁世凱是「爲中國人所能懂得的强的人。」（即是能替美國統治中國的强人）（十八）。而當時是以英帝國主義爲首的。但英美日帝國主義「利用中國的政策有不相同之處：日本是製造中國紛亂從中取利，因之對各種對立勢力常同時操縱，英美則常扶持中國一個最反動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府」。（十九）因之在「帝制」問題上也有不同的態度：

（一）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件時是贊助袁世凱稱帝的，日使日置益除了向袁世凱預祝「高陞一步」外，還對賣國賊曹汝霖說：「鄙國向以萬世一系爲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爲君主，則敝國必然贊成」（二十）。並派大隈重信的親信有賀長雄担任袁世凱的顧問，作爲帝制策劃者之一。而另一面「它深知道經過了辛亥革命的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容忍帝制復活的」。（廿一）因此他又扶助反袁的力量，如岑春煊蔡鍔等。它的目的就是製造中國紛亂以從中取利。

（二）英國是袁世凱的主要支持者，是希望袁世凱能建立一個爲英國所需要的殖民地政權，對於帝制是表示贊成而支持的。英使朱爾典在「帝制」前幾個月曾向袁表示中國應行帝制之意，並告袁「若國中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英國爲「洪憲帝制」確是作了一番很周詳的考慮。

（三）美國在辛亥革命時就譏諷中國人是不適合民主政體，只懂得「皇帝」的。這正表示牠是早巳有心扶助袁世凱作「皇帝」，以便於牠對中國的深入侵略。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間美國的政治流氓，袁世凱的「顧問」古德諾，發表了一篇「共和與君主論，侮辱中國是「民智低下之國」，中國人民「絕無政治智慧」。結論是不能行「共和制」，而如果違背了他的「指示」，則「外人之干涉恐將不免」。這個反動荒謬的「理論」，並沒有嚇到中國人民，但却被袁世凱的一夥盜徒引爲「金科玉律」的「根據」。同時，還借給袁世凱五六千萬美元，這「很明顯是有着政治借欵與投資利益的雙重目的」。（廿二）美國便是如此積極的爲袁世凱準備了「理論根據」和「物質條件」的。

英美日帝國主義便用了這些不同的處理手法，演出了「洪憲帝制」的醜劇。

「洪憲帝制」的進行

袁世凱自從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袁製新約法後，即把總統的權力規定得和皇帝差不多，並在總統的名義下，進行了皇帝排場的改革：廢國務院，設政事堂，以國務卿代內閣總理。六月二十日又成立了更能運用自如的參政院，這個機構主要是修改總統選舉法，並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通過公布。其新內容是：「（一）總統任期改爲十年——連任亦無限制；（二）凡屆總統改選之年，參政院參政如『認政治上有必要時』，得爲現任總統連任之決議，即無須改選；（三）總統繼任人，應由現任總統推荐於選舉會，共名額以三人爲限——被推荐者之姓名，由現任總統預先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臨選時，始行取出，交付選舉會——現任總統則當然得以繼續當選」。（廿三）這樣，中華民國實際上巳經是袁家的中華帝國了。

一九一五年，「洪憲帝制」的進行逐漸表面化，當時袁世凱的黨徒大致可以分成三類：

（一）籌安會派：一九一五年三月立憲黨政客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得到袁世凱「曠世逸才」的「器重」。不久，古德諾又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鼓吹「帝制」。於是楊度以「美國人也如此說」爲根據，進行帝制的籌備。以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爲靠山，糾合一些政客叛徒等組設「籌安會」。主要人物除楊度外還有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共六人，這一撮醜類還恬不知恥的冒稱「六君子」。他們的目的，是在「新朝」做

「高官」，他們在袁世凱所謂「研究自由」的庇蔭下「自由」地鼓吹「帝制」。但是結果他們的脚程趕不上袁世凱的需要。因此成立不到一月便失去它的作用，最後「籌安會」改稱「憲政促進會」，這一撮醜類完成了號筒的作用，便被冷落在一邊了。

（二）實力派：這些人大半都是北洋軍閥在各省占有地盤者。他們的擁袁稱帝，是爲鞏固自己既得利益。所以在「帝制」「轟轟烈烈」時通電擁護，在袁世凱要垮台時便紛紛宣布獨立，倒戈相向。這一派爲袁世凱重視的是段芝貴、倪嗣沖、陳宧等二流角色，而段祺瑞、馮國璋則因「功高主忌」，袁世凱還在想削奪他們的權力呢！

（三）官僚派：當楊度等亟謀攫取權利的同時，袁系的舊官僚梁士詒、朱啓鈐、周自齊、張鎭芳等在帝制高漲時爲了繼續作「新朝」的「顯宦」，便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由於這些人物更理解袁世凱的「內心」，對帝制表現尤急進，因此很快成爲帝制的實際行動領導者，取「籌安會」而代之。他們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舉行國體投票，得到全體御用代表一九九三人的同意，主張「君憲」，接着又演出了「勸進」「再勸進」的二場醜劇，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便接受了帝位，十三日受朝賀，大加封賞。成立大典籌備處，準備明年登極，並改第二年爲洪憲元年。

這齣「洪憲帝制」醜劇的帷幕揭開來以後，就是這樣牛馬神蛇，光怪陸離的一個場面。

竊國大盜結束其反革命的一生

自從贛寧之役失敗後，孫中山即逃亡日本，集合舊同志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及袁世凱圖謀稱帝，孫中山等即擬起來反對，惟當時所採取的尚非眞正組織民衆，而仍執信於軍事冒險，於是先後於一九一四年六月至十月在蘇浙各地的起義，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海肇和軍艦的起義，結果都連續失敗了。同時派往山東、陝西、四川、雲南、廣東、江西各省活動的黨員也僅以聯絡軍隊爲主，並未深入民間組織反袁力量。因此，不能形成反袁運動中的領導力量。

進步黨原來是袁世凱的幫閑黨，他們本是忠心於袁世凱的統治的，也曾對袁世凱的「稱帝」側面提出更「穩妥」的辦法，但已不能爲「急不暇待」的袁世凱所採用，於是當「籌安會」出現時，進步黨的「理論家」梁啓超發表了一篇政治論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在文章中表明他們的態度是：「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又說：「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爲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可也」。（二十四）這就是進步黨所希望的「以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但袁世凱要的是「名實相符」，要的是「皇冠龍袍」。袁世凱操之過急的作法，進步黨意料到會有人反對，那麼與其讓中華革命黨來作，不如以穩健自命的進步黨再來一次政治投機，以控制反袁局面，於是開始了軍事倒袁策動，纂奪了反袁運動的領導權。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的雲南起義是經過滇軍中下級軍官長期醞釀後，在蔡鍔入滇後決定的。那個表面上主持討袁的雲南都督唐繼堯只是大勢所趨不得不從的人物。二十五日雲南正式宣佈獨立。不久貴州、廣西、廣東、浙江等相繼獨立。翌年五月八日各省反袁勢力成立了以唐繼堯岑春煊爲首的軍務院，形成一個以進步黨勢力爲主的反袁大聯合。

這時，袁世凱的主要靠山英帝國主義正大戰方酣，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五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由其公使會同英俄二使勸袁世凱「將實行帝制之期，暫行延緩。次日日使又單獨警告袁世凱「緩行帝制以防禍亂」（二五）。但却又在南方及山東各地公開扶助反袁力量。袁世凱的靠山已不可靠，只得遽命宣布延緩登極。等到一九一六年三月間，不僅滇桂相繼獨立，即袁世凱倚爲腹心的李純張勳靳雲鵬等也密請取消帝制。袁世凱應得歷史懲罰的命運已在開始。他感到事情已非當初所能意料，三月廿二日這個八十三天的未登極的「洪憲皇帝」撤消了「帝制」，但仍迷夢於總統寶座的延續，然而這時，全國人民在唾罵，反對黨的人在進攻，甚至他認爲可靠的一些家奴如陳宧湯薌銘等也於五月二十九日宣布獨立了。袁世凱爲了衮龍的壽衣，已用盡了自己最大的「智慧」，六月六日，這個叛國竊國賣國的大強盜，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袁世凱雖然死了，但是他的思想的政治的靈魂，却在十年以後，由他的後輩蔣介石所復活了！

三　帝國主義操縱下的軍閥政爭

以美日爲依靠的黎段之爭

袁世凱自斃後，任總統的是美國走狗黎元洪，任國務總理的則是日本的奴才段祺瑞。這兩個賣國賊依靠着他們的主子展開了政治上的爭奪。由於兩人是總統府和國務院的「代表人」，所以這個爭奪一般被稱爲「府院之爭」，主要表現在對德絕交與參戰問題上。

自歐戰開始後，英法俄見日本有獨占中國之趨勢，便慫恿中國參戰，日本則以中國參戰與其侵華利益衝突，多方阻止，而袁世凱也恐影響稱帝，所以參戰問題，未成事實。一九一七年二月，德國施行無限制潛艇政策，美國爲掠奪更多利益，暫時放棄其軍火生意，「宣佈加入這個強盜戰爭」，

並通知了北洋政府。它「希望把中國人民捲入這個大屠殺的血泊之中」【二十六】，北洋政府即「遵命」於二月九日向德抗議。這時，日本既已取得二十一條之權利，並與英法俄成立「五國諒解」，四國對日本「承認其非法取得之山東及領有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以爲允許中國對德絕交之交換條件」【二十七】。因此不僅贊成中國參戰，更以金錢武器援助段祺瑞進行「參戰」準備，陰謀獵取更多的權益。可是美國卻感到中國參戰反是給日本造一機會，所以又表示中國可暫緩參戰。美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參戰問題上的變換態度，正是黎段政爭的一個基本因素。

當時主張參戰的，主要是軍閥段祺瑞和政客梁啓超，而反對的，除了黎元洪外，還有孫中山唐紹儀等。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日黎元洪藉口國會尚未通過，拒絕簽署段祺瑞擬給日帝的電稿，於是段便去津以要脅黎之屈服。當經另一軍閥馮國璋的「調解」，黎元洪接受了段的條件，應允撤換政府秘書長，並不干涉對德外交問題【二十八】。六日，段祺瑞意氣自得的由津來京，八日即將對德絕交及中國希望之具體條件秘密奉告日本，其具體條件的內容是（1）撤消德奧庚子賠款，（2）增加進口稅五成，（3）解除辛丑條約中部分束縛【二十九】。這個內容曾遭到他主子的「叱責」。十一日德國「碍難取消其封鎖戰略」的覆照到京，於是北洋政府於十四日正式宣佈「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三十】。

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軍到京成立督軍團，開軍事會議，做在國會通過「參戰案」的準備。這時，日英法各國公使均表贊成，而法使且在宴請各督軍時聲言：「中國應立即對德宣戰，國會之意見不關重要」【三十一】。段祺瑞在軍事會議上就自議自決的通過了「參戰案」。

五月十日正當衆議院開會討論時，段祺瑞便陰令部下吳長植、胡金標之兵士及一些流氓乞丐有三千餘人，以「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北京市民主張參戰請願團」等名義，由其親信靳雲鵬、傅良佐親任指揮，來「包圍議院，兇毆議員，封持議會」，其目的「是爲將參戰案通過」【三十二】。

爲美帝和「國會」所支持的黎元洪與以日帝及「督軍團」爲後盾的段祺瑞之間的政爭益形緊張。

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先發制人的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並以親美派的伍廷芳繼任。段祺瑞「憤然」出京後即發出了：「……將來地方國家，因此（指段之免職）發生何等影響，祺瑞概不能負責」的教唆性通電。果然，二十九日段之親信倪嗣冲、楊善德、張懷芝、張作霖等相繼宣告獨立。六月間，日本乘亂，「由日人佃信夫出面活動辮軍頭子張勳與段祺瑞合作實行『復辟』，驅逐作爲美國工具的黎元洪」【三十三】。十三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次日張勳由津到京。接著，以張勳爲首的一羣封建醜類摘下了中華民國的空招牌，實行「復辟」。

德國指使下的「張勳復辟」

張勳一直是虔心於「重整清室」的反動事業。他和他的軍隊都保留了作爲滿清王朝標識的髮辮，而事實上他也努力的作著「復辟」的準備。一九一六年的六月、九月，張勳曾二次召集北洋系統的各省督軍在徐州開會，而第二次的徐州會議還出現了「十三省省區聯合會」的組織，雖然與會者各有用心，如馮國璋（有代表到會）是借此謀總統的地位，倪嗣冲是借此擁段。但張勳確是想借此團結勢力，作爲其實行復辟的基礎。【三十四】

同時，張勳又是德國在華的代言人，當一九一三年贛寧之役發生時，德國即曾自青島接濟張勳軍火，並在進攻南京時，有德人薩爾斯門隊長曾得長官許可，隨軍同往【三十五】。而當一九一七年三月，北洋政府對德絕交後，「德國爲阻止中國結合到協約國方面去」，便「組織了反對黎元洪政府的君主政體的陰謀」。【三十六】這個陰謀是需要通過張勳而體現的。

張勳在中外反動派的主子面前，爲了表示自己的忠盡，便在等待着時機的到來，實行「復辟」。

一九一七年五月黎段因參戰問題交惡，各省督軍宣佈獨立，黎元洪求告無門，而日人佃信夫又出面撮合張段的合作，這正給張勳一個實行「復辟」的機緣，於是便在六月二日派李盛鐸到京向黎表示「願任調停」，黎也想倚張自保，便接受張勳要求，於十三日下令解散國會，次日張勳即由津抵京。不久頑固透頂的保皇黨康有爲也趕至北京，許多封建遺老被張勳收羅起來，這正是醞釀著一個新的政變的發生。七月一日，張勳等便從故宮中擁出廢帝溥儀，實現了他們「奴顏婢膝」的願望。

被恢復的溥儀政權，把民國元年的七月一日改爲宣統九年的五月十三。設置了成套的封建官員：內部有議政大臣，各部尚書侍郎，外部有總督巡撫提督，這些官員就是把那些久已丟棄的政治垃圾裝扮起來粉墨登場的。已經被用作裝殮死屍的「朝服」每套由二十元漲到一百二十餘元被「新貴」們蒐購一空。許多被解除武裝又拘置於西山的德使館衛兵，也被放回並發還他們的武裝，傳說還有參加戰爭的。

但是，北京市面卻紊亂擾攘，物價高漲，紙幣落價，紙幣一元只換銅元六十七枚（一般可換一百二十枚）。銅元票也七折使用，小商店且拒用紙幣，因之有時會買不到食物【三十七】。辮兵不論商店住戶的到處搶掠，他

們最中意的是便於携帶的銀元。【三十八】

在張勳實行「復辟」的同時，段祺瑞得到日本一百萬日元的佽助，便背棄與張勳合作的盟誓，組織討逆軍，進行奪取政權的軍事行動，七月十四日辮兵潰敗，張勳逃入荷蘭使館，短短十四天的復辟政權宣告結束，中華民國的政權又重落北洋軍閥段祺瑞之手。此後日本則通過段祺瑞將從中國掠去更多的權益，給中國人民造成更大的災害。

段祺瑞的賣國罪行

日本帝國主義看中段祺瑞是唯一能承繼袁世凱的理想人物——因爲他是北洋軍隊的實際控制者；段祺瑞則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爲靠山，以擴充其北洋軍的皖系勢力。因此在「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重握政權時，卽開始加强了他的賣國罪惡活動，如：

（1）可恥的參戰：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的對德奧宣戰，主要就是爲符合日本主子的要求，就連日本人也不隱諱的說：「使段決行參戰之惟一力量爲日本」【三十九】。這次可恥的參戰，段祺瑞的北洋勢力得到擴充，積蓄起進行內亂的資本；但是十七萬五千的勞動者竟被段祺瑞驅送到歐洲及美索不達米亞去爲强盜戰爭服役。

（2）對日大借欵：段祺瑞自對德宣戰以後，需要大宗欵項來擴充勢力，消滅異己；日本寺內新內閣也正決定了更其狠毒的投資侵略政策，以獲得在中國的權益並製造內亂。因此從一九一七年八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日本會以各種各樣的名目借給段祺瑞三萬萬零三百二十萬元的巨款（零星小款尙不計在內）【四十】。這一大批借款主要是由日寺內內閣的財政大臣勝田主計主持，由政客西原龜三往返促成的。日本以各色名目借欵買走了中國各色名目的主權，如：東北、蒙古的鐵路修築管理權，無線電台和有線電信的設立權，吉黑二省的森林金礦採伐權……等。段祺瑞則把大拍賣的收入作了下面的用途：（1）從事對西南的戰爭，以實現其武力統一政策的夢想，（2）編練參戰軍三師四混成旅，作進行內亂的資本，（3）製造安福系國會，竊取政權，以便更順利的出賣中國。

（3）訂立反動賣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一九一八年三月段祺瑞爲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共同進犯蘇聯而訂立這個「軍事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日本可以「合法地」取得中國陸海軍的一切統治權，其中包括：訓練、駐紮、軍事設置、軍事製造、軍事機密……等。此約訂後，東北蒙古新疆等處便出現日本軍人的足跡。當時卽已有認爲此約較二十一條件尤爲厲害。一九五〇年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徐樹錚故宅發現此協定的說明，內容是更具體細緻的把中國的資源與軍權恭送給日本，由此益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與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罪行」了【四十一】。

（4）山東問題的換文：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段祺瑞的駐日公使漢奸章宗祥在與日外相後藤新平交換關於山東問題的覆文中，對於日本侵奪山東特權，竟表示了「欣然同意」，出賣了整個山東，爲後來中國要爭回山東權利時留下極嚴重的障碍。

段祺瑞的罪行自不止於此，他比袁世凱更多的出賣了中國的權益，他的賣國行爲早已爲國人所唾棄，但是他的一脈相傳的得意門生蔣介石，在他死後還追贈給他與蔣介石同樣的「陸軍特級上將」的「尊榮」。原因是這二個賣國賊本是一丘之貉，那就無怪其聲應氣求，後先輝映了。

南北軍閥的對峙

「復辟」失敗後，北洋軍閥馮國璋作了大總統，與段祺瑞共同把持了北方的政權，段祺瑞更進而廢除臨時約法，召集所謂「新國會」。因此在海軍擁護下的孫中山便在廣東召集舊國會議員開非常議會，組織軍政府，樹立了南方政權。這樣就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因爲南方軍政府是以維護臨時約法爲號召來反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所以彼此間的軍事行動被稱爲「護法戰爭」。當時南北的情形是：

（一）北方：段祺瑞仍一本其武力統一政策對西南各省的反對者進行「征討」，但這時北洋軍閥內部已開始分成馮國璋和段祺瑞的兩派，被派到湖南去打仗的范國璋、王汝賢是屬於「主和」的馮派的，而王汝賢希望的湖南督軍的席位又被段派了傅良佐獵得，因此范王在戰爭上表現消極。一九一七年十月間，湘南和四川的北軍相繼失敗。十一月十四日范王等更通電全國停戰，這個通電立卽得到馮派的曹錕（直）、王占元（鄂）、陳光遠（贛）、李純（蘇）等四督軍的同調。段祺瑞在內外合作的反對下，便辭去國務總理專任參戰督辦。並向北洋大小軍閥發出通電說：「我北方軍人分裂，卽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方實力消亡，卽中國消亡之朕兆」。希圖以此來聳動北洋軍閥，共同團結在北洋旗幟之下，供其驅使。

馮國璋的「主和」，旣遭段派軍閥倪嗣冲張懷芝等的反對，又未能取得南方的看重。戰爭仍然在繼續，段祺瑞仍然掌握著主要的軍權——參戰軍。

因此使段祺瑞能趁機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又重任國務總理。這時，北方軍隊在吳佩孚的指揮下，有了一些勝利，段祺瑞與高采烈的在預祝「武力統一」的成功，但是由於曹錕吳佩孚並未得到他們所希望的祿位，於是在八月間，便由吳佩孚發起了「和平運動」，通電請罷內戰。至此，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便徹底粉碎了。

九月間，老奸巨猾的官僚徐世昌藉馮段相爭的機會，由混血的國會產生爲新的總統。馮段雖然同時去職，但是彼此間的矛盾並未因之消除，反而加遽，漸漸發展爲不久以後發生的「直皖戰爭」。

（二）南方：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得到海軍的擁護在粵召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來進行護法，九月一日孫中山被選爲大元帥，滇桂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被選爲元帥。因爲唐陸二人始終是承認北方政府的，所以並未宣誓就職。

孫中山所領導的軍政府除了有一點海軍力量外，主要軍事力量仍操在南方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之手，孫中山不但不能調動這些軍隊來從事護法事業還要不時受到軍閥們的襲擊，最後，孫中山這一點海軍力量也不能爲軍閥們所容，於一九一八年二月竟將海軍領袖程璧光刺死。

南方軍閥的所以反段，是因爲個人的地盤，名位，同時南方軍閥唐繼堯和北方的軍閥馮國璋都是英美帝國主義豢養的代理人，所以很容易也必要聯結一氣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豢養的代理人段祺瑞。

非常會議的舊國會議員大部分和北方新國會議員同樣地卑鄙無恥求龕於軍閥，他們是藉護法以升官發財，他們不想如孫中山那樣的真來護法，所以就接受軍閥的指使提議改組軍政府，改大元帥制爲總裁的合議制，新的總裁七人中雖然包括了孫中山，但主要是桂系軍閥。孫中山深刻的認識了軍閥的本質是「南與北如一丘之貉」，所以於五月四日辭去大元帥職務，離粵赴滬，而新任的主席總裁岑春煊則由滬到粵，至此，軍政府已成爲南方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了。

以護法爲名的南北對峙局面，從北方的徐世昌繼任總統，南方的軍政府改組以後，雙方卽互爭權利兵戎相見的「南北戰爭」進到彼此分贓討價還價的「南北議和」階段，自此以後，「中國就在這種分散，無政府和帝國主義主宰底忽冷忽熱狀態中一直渡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四十二】。

（未完）

【註】

（一）陳伯達：竊國大盜袁世凱
（二）葉爾瑪朔夫著、李相崇徐醬青譯：亞洲曙光一九〇頁
（三）前書一八四頁
（四）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二〇九頁
（五）馬震東：袁氏當國史一六六頁
（六）當時約請的尙有黎元洪、黎因疋當謀殺張振武方維之後爲時論所不滿故未至京
（七）朱偰：北京財經史話（見北京史話）
（八）葉爾瑪朔克著、李相崇徐醬青譯：亞洲曙光一八四頁
（九）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六九一頁
（十）前書二三四頁
（十一）羅光：陸徵祥傳一〇四頁
（十二）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六三三〇頁
（十三）馬震東：袁氏當國史四八四頁
（十四）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六三九七頁
（十五）民國四年四月七日漢口鎭守使杜錫鈞致徐又錚函
（十六）馬震東：袁氏當國史四八六頁
（十七）吳濤譯浮田和民：支那之將來（東方雜誌九卷九號）
（十八）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五四六頁
（十九）劉大年：美國侵華史一〇三頁（人社）
（二十）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五五六頁
（二十一）前書五四四七頁
（二十二）劉大年：美國侵華史一〇三頁
（二十三）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四一七頁
（二十四）梁啓超：盾鼻集論文第四
（二十五）馬震東：袁氏當國史五二四頁
（二十六）劉大年：美國侵華史一〇四頁
（二十七）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七八四頁
（二十八）溫世霖：段祺瑞賣國秘史一六頁
（二十九）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第五章
（三十）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六九〇頁
（三十一）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第五章
（三十二）溫世霖：段祺瑞賣國秘史一七頁
（三十三）劉大年：美國侵華史一〇五頁
（三十四）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四八五——四八六頁
（三十五）張體奮：復辟詳志第三十二章第一節
（三十六）古柏爾等著吳清友譯：殖民地保護國新歷史上卷第四冊一二二頁
（三十七）張體奮復辟詳志第十章第五節
（三十八）前書：第二十八章第四節
（三十九）西原借款秘史第十五節
（四十）關於段祺瑞向日借款的詳情可參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七、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第五章，溫世霖段祺瑞賣國秘史
（四十一）榮孟源：中國近代史史料零拾（一九五一、二、十六、天津進步日報史學周刊）
（四十二）葉瑪爾朔夫著李相崇徐醬青譯亞洲曙光一九一頁

天津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五十號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四十六號

本期零售每冊二千八百元

$1.00